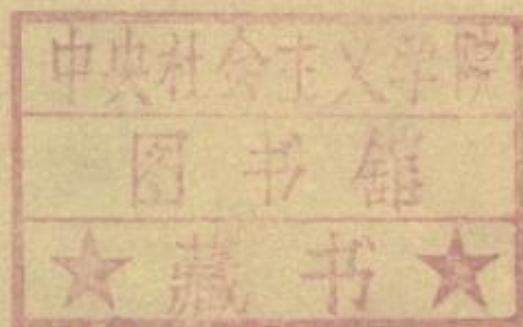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回忆录

俄国人1949年为什么逮捕我？  
它可能与中国的关系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回忆录

---

俄国人1949年为什么逮捕我？  
它可能与中国的关系

陈裕年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出版说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美国著名的女记者和作家，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从年轻时代起，她就投身于进步的社会活动，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她坚定地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到过苏联，中国，西班牙，波兰等国，采访和报道这些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写了很多文章和几十本著作，为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事业，为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作了大量的工作。

从1925年到1970年将近半个世纪中，斯特朗先后六次访问中国，后来长期居留中国，向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国人民的斗争和成就，直至逝世。本书是她生前的一份手稿，写于1967年1—3月。这次出版时经过译者的整理，并由编者对主题无关的部分作了删节。各节标题系编者所加。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 目 录

前 言.....	1
1. 离开延安.....	6
2. 在莫斯科被捕.....	20
3. 监狱里的五天.....	36
4. 被驱逐出境.....	48
5. 在美国东部.....	63
6. 回到西海岸.....	82
7. 美共对我的抵制和打击.....	96
8. 意外的平反.....	114
9. 重游莫斯科.....	134

# 前 言

有人建议我写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是《我转换世界》<sup>①</sup>所写的年代以后的经历。我那本书只写到了1934年，自那以后，已有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是我的生活最为活跃的时期，我今后大概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把这些年的事情统统都写完。我在这个时期所做的事，包括西班牙内战时，1936年和1937年两次到西班牙去的旅行；这两次旅行的结果，使我写出了《战斗中的西班牙》<sup>②</sup>和《在西班牙的美国佬》<sup>③</sup>两本书，后

---

① 《我转换世界》（“I Change Worlds; the Remaking of An American”），1937年出版，是斯特朗的自传，叙述1935年以前她在美国和在苏联的活动，以及历次访问其他各国革命情况的经历。——译注

② 《战斗中的西班牙》（“Spain in Arms, 1937”），1937年出版。——译注

③ 《在西班牙的美国佬》（“The Yanks in Spain”），由于美国共产党的内部破坏活动，这本书一直没有能在美国出版。——译注

一本到现在还没有出版。我在这些年所做的事，也包括几次到中国的旅行，这几次旅行大部分已经写进别的几本书里了。此外，还包括1940年到立陶宛去的一次短期旅行，那时这个国家正在投票表决加入苏联（关于这，我写了一本小册子：《立陶宛的新道路》<sup>①</sup>）。我在1940—41年间，自莫斯科坐飞机到中国，路经阿拉木图，从那里飞越沙漠地带，到了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又从重庆飞过日本防线，到了香港。我在1941年1月回到了美国，带着有关国共冲突的许多资料，准备到纽约后发表。

以后的三年：战争在太平洋上展开，我留在美国，到各地演讲，也到加拿大去演讲，这时这两个国家都卷入了世界大战；这期间，我在好莱坞执行了一个短期合同，为一部电影的制作，担任了“俄国专家”；这以后我在帕洛阿尔托住了下来，写了关于苏联的三本书，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总结了我所见到的那个国家的情况。这些书就是：《苏联人民预料到了》<sup>②</sup>，《多民族的苏联》<sup>③</sup>和《澎湃的河流》<sup>④</sup>。

再补充一点：我曾在1939年进行了一次横跨美国的汽车旅行，来调查美国那时执行“罗斯福新政”的情

---

① 《立陶宛的新道路》（“Lithuania's New Way”），1941年出版。——译注

况；结果写成了《我的祖国》<sup>⑤</sup>。我在那次旅行中，顺着一条曲折的路线，坐汽车从洛杉矶往北开到了西雅图，又往东顺着黄石公园和北达科他、衣阿华开到了底特律；以后再经过田纳西流域行政区直下佛罗里达，然后又往北开到了东海岸。就是这次旅行的结果，罗斯福夫人邀请我到她的海德公园家里过了一夜。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丈夫<sup>⑥</sup>来到了美国，主管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苏联馆的工作；我们同在佛乐欣住了几个月。

1944年，战争仍然封锁着大西洋和太平洋上从美国到莫斯科的交通线，但是美国国务院终于同意发给新闻记者的出国护照；我坐飞机从费尔班克斯起飞，经过阿拉斯加，越过北极，直到西伯利亚铁路。我发现德国人已经从明斯克撤退了；我停留在仍处于战争状态

---

② 《苏联人民预料到了》(“The Soviet Expected It”), 1941年出版。本书主要是论述苏德关系和苏联的卫国战争。——译注

③ 《多民族的苏联》(“Peoples of the USSR”), 1944年出版。本书主要是向美国人民介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情况。——译注

④ 《澎湃的河流》(“Wild River”), 1943年出版。是用长篇小说体裁来描绘苏联人民的英雄业绩。——译注

⑤ 《我的祖国》(“My Native Land”), 1940年出版。——译注

⑥ 1932年左右，斯特朗在莫斯科同一个俄共党员乔尔·苏宾(Joel Chubin)结了婚，他是一位作家和编辑。——译注

中的莫斯科，直至1945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是用于进入波兰的几次旅行上，在那里我写了波兰的新政府，它首先在卢布林建立了起来，后来到了罗兹，最后到了华沙。我写的《我看见了新波兰》一书<sup>①</sup>，概括了这一时期的情况。后来我乘了一艘苏联货轮，从巴统出发，经过土耳其的达达尼尔，回到了美国，那时和平时期的交通还没有恢复。

1946年初夏，我在美国巡回演讲之后，从旧金山坐了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上海，这架飞机以高价出售机票，却没有舒适的座位。这次旅行决定了我后半生的生活方向。从上海飞到北京之后，我发现可以到延安和几个别的“解放区”去访问，这些地区已经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统治之下，并为共产党所组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守卫。我在中国停留了9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在解放区。当我在1947年3月最后离开延安时，我自己已经知道我还要回到中国来；如果可能，我愿意在中国度过我的后半生。这样做的理由，我已经在一些文章和书里说过了。

关于在这以后一个时期的经历，人们常常问我：“你是否曾经听说过为什么俄国人逮捕你，并把你叫作

---

<sup>①</sup> 《我看见了新波兰》（“I Saw The New Poland”），1946年出版。——译注

间谍？”我的答复是：我从来未被告知逮捕我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关于此事的任何确实的说法。但是，关于此事，我已经想了很多。当我被捕的那一瞬间，我就开始想，一直连续想了好多年。我作过很多推测。我不怀疑的是，除非是由于某个低级官员的偶然错误，而这很不象，逮捕我的原因必定与我同中国的关系以及俄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有某种联系。当我在1949年2月14日被捕时，在这两个国家间并没有出现公开的冲突。但是，现在回顾过去，我可以看出当时我没有觉察出来的许多矛盾。

所以我想，即使我没有时间来把三十年的经历全部写成回忆录，而只把我自1947年离开延安起，直到1958年最后又回到北京为止的全部事情，比较详细地分析一下，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不仅作为个人的回忆录来看是有价值的，而且这样来显示公开冲突发生前十年间的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将从我怎样离开延安写起，试把以后几个时期的全部有关情节统统写出来：即把我被捕以前的一个时期和我被捕期间以及不加说明地指控我是间谍，使我住在美国的那一更长得多的时期，直至莫斯科1955年为我平反，和我能够开始再在国际间旅行之时为止的所有情节，全部都写出来。

# 1

## 离开延安

**在**我离开延安之前的那天晚上，我被邀请去向毛泽东主席告别。他这时已经离开了他在延安的住所，因为城里的人正在疏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撤到不很远的山里了。事实上，这也是我要离去的原因；这时我住在“美国大院”，抗日战争时美国在那里设立了一个联络组，那里接待一切西方客人。

那天我接到周恩来的邀请，要我到杨家岭的礼堂去看戏。可是我知道他们已经走了。那天他们只是回来一晚，在这里演一场告别的戏。对于我来说，那天晚上不告诉院子里的美国军方人员，自己一个人走到剧场去并不很困难。我被引到前排的一个席位，看见我曾会见过的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也都坐在那里。夜晚非常冷，我们都穿着棉衣，有的还穿着皮衣，在一些放

在头排观众和戏台之间地上的炭盆上暖手。

戏演完了以后，周恩来带着我进入山边一个窑洞，那里已经摆好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还有茶和花生。我在那里最后一次和毛主席谈话。他肯定我不能随同共产党一起到山里去，并说，我已经知道了外界需要知道的关于他们所有地区的情况，我应该带着这些情况走向世界。“当我们再同外界取得联系时”——他认为这需要“大约两年”——我可以再回来。他说，我特别应该把这些情况带到美国去。他说，他不认为有必要让我把这些情况带到莫斯科。我不能回想出他说的确切字句，而且翻译也不一定准确。所以我不能说，毛主席是不是特别建议我不要到莫斯科去。我那时的印象是，他只不过是说美国人民需要知道这些情况，而莫斯科不需要。因此，我不应在莫斯科浪费时间，而应直接回到美国。两年以后，我在莫斯科的监狱里，又想起了毛主席的话。我想，就在那时，他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中苏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并且预先叫我不要去呢？

不管怎样，我是带着直接从上海飞回美国去的意图而离开延安的。我没有任何要在路上转到莫斯科去的打算。但是这个计划为美国共产党的态度推翻了。在到上海后，我给一个可能关中国的左翼组织“远东政策民主委员会”发了个电报说，我有从延安和共产

党领导的其它解放区得来的最新情况，要求他们尽快在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安排三次大型报告会，来弥补我从上海回来的飞机费用。但是，他们连给我回一个电报的费用也不肯浪费，他们只回了我一封航空信，说我想开有关中国的大型报告会简直是发痴：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丢掉了他们所有的大城市，人们对他们的兴趣已经一落千丈了，最多只能期待在冬季或许可以安排一次费用不大的巡回演讲。同时他们建议我从莫斯科回去，因为人们对苏联较有兴趣。我接到他们的回信时，正在上海百老汇大厦的一个房间里，忙于写着我在上海所经历的一切，同时也忙于应付各种各样来找我的人，给他们所需要的情况资料。

我的计划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要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向世界各地传播，特别是要向美国传播，同时也不得不受限制于我所了解的技术条件。在美国举行演讲会的季节快要过去了。我并不是需要钱来旅行，而是需要能起重大作用的演讲。如果不是为了这个，那我还不如呆在上海写作，直到我能写完一本书为止。上海这时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个组织的中心，许多国家的代表都在这里。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来我的住地，询问中共情况。我知道我那些关于延安的情况资料，被人们急切地拿去了，正在送到印度，东南亚，菲律宾

和日本，同样也正在送到欧洲。我觉得我到达了世界的许多地方，虽然还没有到达那个最关重要的国家。<sup>①</sup>不管怎样，除非我的书已经写了出来或者在美国找到了重要出路，否则我还是在上海呆着最好。特别是因为有好几个星期，还可以利用偶然来往的飞机，同中共的领导人互通消息。

于是，在上海期间，我把在中国解放区见到的情况，写成了一本书，书名《中国的黎明》。“救总”的一个印度代表，把一份稿子送回了印度，那里有两家出版社都想要，结果由印共的出版社印了出来。一个日本人要把这书的稿子送到日本去，我给了他一份原稿，但是结果如何，没有下文。我把原稿打了好几份，送给纽约和伦敦的我的著作代理人。这以后，夏天来到了，要想在美国来个大型演讲会，已经太晚了；我写完了几篇短文，寄给美国的出版社（从上海寄去的文章要比在纽约投送的稿件更能引起注意），并准备回美国去。

在上海写的文章中有一篇特别值得一说。文章的题目是《毛泽东的思想》。它不是根据毛泽东自己在延安同我的谈话，而是根据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告诉我的有关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来源等材料而写成的。这些同

---

<sup>①</sup> 这里指美国。——译注

我谈话的人当中有刘少奇，他同我谈了一整天，在谈话中他论述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创造。我把这次谈话和其他谈话写在一起之后，就给了这样一个标题。在我最后离开中国之前，我曾把它送回到延安的领导人那里去修改，修改以后发表在纽约一家现在已经不能出版的左翼刊物《美亚》杂志上面。今天毛泽东思想已是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中国专家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不管怎么说，我那篇文章是世界上发表的第一篇论述“毛泽东的思想”的文章。我后来知道，中国的领袖们表示很高兴，别的友好作家，只不过描述了他们的成就，而我还注意写他们的理论。此外，我还认为，我的这篇文章以及它所引起的东欧某些国家的注意和重视，可能是我被捕的原因之一。

\* \* \*

住在百老汇大厦时，我有相当多的机会可以看见处在国民党统治压力之下，以及几乎必须说是处在美国占领之下的上海生活的某些方面。很多美国军队，它在法律意义上是中国的抗日盟军，驻扎在上海。当我走向街头时，我可以看见美军对待市民们的傲慢行为。有一次一辆汽车，满载着美国兵，在街上高速行驶，突然间改变方向，窜到马路的另一边，以便在那边拐弯处停车。结果，给中国人造成了相当大的交通困

难，使人力车和汽车挤到了一起，都不得不停下来，甚至还得倒退。我还想起来，有些学生大胆进入百老汇大厦来找我，想得到延安的情况。当时我对他们的安全是多么的不放心，因为他们很可能被蒋介石的警察所逮捕。我又清楚地回忆起来司徒雷登给我的印象，那时这位曾任北京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驻华大使，在关心中国人民疾苦方面，还负有声誉。他叫人传信给我，他想同我谈谈延安。我很乐意地去看了他，因为象这样的神话，那时还是存在的：说什么马歇尔将军来中国，目的在于平息国共之间的内战；还有说什么美国公众舆论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在政府这一级上也存在着一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品质的倾向。可是我吃惊地发现，司徒雷登对我所告诉他的关于延安的政策或人物的任何事情，一点点兴趣也没有。他只有一个问题：他如何能够与中共领导人取得联系，以便“谈判和平”。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已经离开了延安，消失在群山之中。美国大使没有办法去联系，这使他烦恼。他好象有这样的想法，由于我不久前在延安呆过，我可能会有联系的办法。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焦急，看来很不寻常。我问他为什么要同他们联系，他说他想讨论和平谈判。我建议他在报纸上宣布此事，他们大概是会得到这个消息的。可这完全不合他的意。我又问他：

“什么样的谈判？你们谈判时还继续打不打仗？”他好象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最后他说，“在谈判时我会坚持停火的。”我指出这行不通。但他不懂为什么行不通。

我解释说，“看看当前的形势吧。整个华北，还有东北，蒋军据守着设防的城市。美国把他们空运到了那里。在他们周围的乡村里，农民们站在共产党的一边；蒋军出来抢东西时，他们就打它。现在你要停火。可是停火后蒋介石的军队还要不要吃饭？或者，在停火后他们可以不吃东西？如果他们要粮食，是美国空军运给他们，还是他们得从农民那里去搞？如果他们到农民那里去搞粮食，农民会给他们，还是要抗拒？在这样的形势下，就停止不了打仗。”

他看不到这个形势，因为他拒绝看。这时我想，象他这样一辈子住在中国的人，对于存在的事实这样无知，实在令人吃惊。

\* \* \*

当我最后写完我那本关于中国的书和我必须写的其他文章时，已经是夏天了。我确实感觉到（一方面由于纽约来信，同时也由于季节已晚）除了我的一个代理人为冬季演讲而进行着一些缓慢安排以外，在美国我不可能再安排什么演讲了。这时再也没有别的事情使我留在上海，我就决定不管怎样，我都得回到美国去，

我预定了飞机票。但是使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苏联驻上海的领事来看我，并且说莫斯科来了指示，说我可以去访问北朝鲜。原来，早些时候我曾偶然在某处遇到过他，我曾表示我想去北朝鲜访问。他把这当作了正式申请，并办出了结果。不过他说，没有可以从中国直达北朝鲜的路线，我必须先坐船到海参崴，再坐几小时向北开的火车，然后才能坐上往平壤的飞机。他这样说，使我吃了一惊，不知如何是好。我已经忘了早先的申请，而且正在计划回美国了。

接着我想：关于中国的书，我已写完了，夏天又不可能安排演讲，并且所有美国朋友都要我去莫斯科，而北朝鲜自太平洋战争结束以来还没有任何外国作家访问过；我可以访问北朝鲜，然后再经过莫斯科，直接回到纽约。于是我就不坐去旧金山的飞机，而改乘苏联船，到了海参崴，并访问了北朝鲜。

\*                    \*                    \*

路过大连时船停下来，一些苏联乘客搭上了船。我在岸上盘桓了一些时候。苏军仍然占领着那里，但是地方上的市政府和地区政府完全是中国人了。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那里的市长和地区官员，既不效忠于蒋介石，也不效忠于中共，而是热中于打听消息。当人们听说我到过延安，他们就要我讲延安的情况。自然，我

就讲了。

\* \* \*

在海参崴，我首先注意的事情是苏联报纸上关于中国的新闻。我急切地弄到了从莫斯科来的最新的中央报纸，从中寻找官方消息。我弄到的不是《消息报》就是《红星报》，后者是军方机关报。我忘掉了找来的是那一种报纸了，但是我知道它有资格代表苏联在军事新闻方面的看法。那上面发表了一篇一位高级军官的长文章，讲的是“两年来的中国内战”。我仔细地读了它，开头是热切地读着，然后是震惊。因为文章是以中共的最后一座大城市延安的“不幸”撤退来结束的。很明显，这是一种失败的语气。作为共产党的报纸，剩下的假设是：有一天共产主义势力还是会在中国再度起来的；而现在，他们显然是失败了。很清楚，这篇文章作者对于我已经在解放区了解到的中共战略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是以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战略来设想中国的内战的，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是寸土必争地牺牲了大量人力，中共的战略则不一样。他们痛痛快快地放弃土地以保持有生力量，来消灭敌军。我清楚，他们离开延安是为了更好地把蒋军陷入城市。

我决定一到莫斯科就得把这告诉俄国人。这时，我已得到了去北朝鲜的签证，到那里去的旅行在迅速

地安排着。这次旅行已在两本小册子里描述过了。我在这里只想说一说的，在平壤我所能讲的关于中国的每一件事情，都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他们表示想要出版我的书，可是没有时间来抄写稿子。我答应从莫斯科寄给他们一份。后来我照寄了。可是，他们是不是收到了，我没有听说过。

\* \* \*

在莫斯科，我和我丈夫的两个姊妹共用的寓所那时还可以供我住宿。我立刻设法传播我在中国的见闻。我记得那时曾经给我认识的苏联外交部长写过信，说我不但访问过延安，而且还访问过许多别的中共解放区，并且说我愿意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他。但是我却没有得到回信。我走访了《真理报》和《消息报》，发现他们的国外新闻编辑对我的材料很有兴趣，但是他们同总编辑讨论之后，却不要我的文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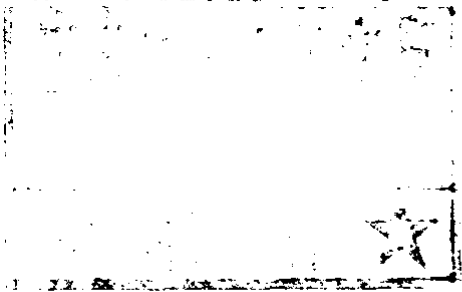
我有点惊异的是，《文学报》的编辑忽然来找我，说他从《真理报》那里听说我有关于中国令人感兴趣的资料，他愿意谈谈这些文章。我有点失望，我回答说，我的材料他是不会有兴趣的。因为我不懂中文，我一点也不了解中国文学或中国作家，他们的报纸想必是专搞文学的，而我的材料是讲军事战略和经济的。他回答说，他知道这个，可是他愿意看看。结果他发表了两

篇文章，一篇关于军事战略，一篇关于毛泽东。我后来听说，如果文章的内容两家主要官方报纸不愿发表，而他们又不愿让人看出这些文章被扣压下来，就常常让《文学报》来发表。几个星期以后，我在东欧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中国新华社的代表，他告诉我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看到了这些文章非常高兴。

我马上从莫斯科写信到纽约，安排在美国的定期演讲会；我发现我只能通过一个代理人，安排明年一月才能开始的一种普通巡回演讲。同时我又重新缮打我那本关于中国的书，设法在莫斯科出版，也在东欧出版。在这方面，我在中国认识的迈克尔·鲍罗廷给了我一些帮助。他这时是苏联新闻局的一个副编辑，那个机构是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为了对外（特别是对东欧）发送宣传材料而创建起来的。他很有兴味地读了我的原稿，并且推荐给同在那个局里工作的一些人，同时也推荐给莫斯科一家在苏联国内发行俄文图书的出版社。

重打原稿时，我又把它重新组织了一下。印度已经接受的那第一个稿本开始讲的是延安的一个中国农民。现在我想，在欧洲出版，它最好是先从中国革命的国际重要性讲起。于是材料就这样重新改组了。

同时在我家里，我开始从人们私下的议论中去了解当时莫斯科广泛流传的观点。一个在外交官学校学



习的青年来找我丈夫前妻的女儿，她这时正在莫斯科看望我。在谈话过程中，他轻蔑地说中共“已经失败了”。我回答说，正相反，他们正在走向胜利。

“啊，不，”他说，“他们已经失掉了他们所有的大城市。”

“这是战略，”我断然地说。“他们将使蒋军在这些大城市里陷入困境，然后开始战胜它。”

他傲慢地微笑着说，“他们不会战胜的。他们没有工业，没有无产阶级。”

他走了以后，我丈夫前妻的女儿继续同我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我很高兴听到你所说的中共情况。”她告诉我，在她熟悉的列宁格勒海军学校里，她所听到的说法同她那个青年朋友从外交官学校听来的说法一样，这些人对中国内战都有同样的看法。“糟糕的是，中共不能打赢，因为他们没有无产阶级。”看来，这显然象是官方的看法。

无论是莫斯科的出版社，还是苏联政府的新闻局，好象都不想出版我的书。我越来越不能安心下来，我亲自到东欧走了一趟，去安排我那本书的出版。我发现相当有人对这有兴趣。在布拉格，我被要求去参加一个包括有党的领导人在内的高级讨论会，讨论我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哥特瓦尔德没有到，但是许多别的

领导人都出席了。如果我记得正确，讨论的题目是“毛泽东的思想”；捷克的领袖们表示希望得到一份抄本，让他们自己去出版。

我把我写的那本关于中国的书安排到七八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去出版：安排到了布拉格，华沙，布达佩斯，巴黎，柏林，罗马和贝尔格莱德。我只访问了这些首都中的两个，其余都是通信安排的。东欧各国对中国的兴趣都很大，这时同南斯拉夫的分裂还没有发生，我的书是另外一个首都的编辑为我在那里安排的。我自己的这一回忆有这样的事实根据：我必须另打一套副本来满足这些需要。同时，我怀着一种胜利感回到了莫斯科，准备去美国。

在看到苏联新闻局显然不起作用后，我却能把我的书安排到那么多的欧洲国家去出版，我记不得鲍罗廷对于我的这一胜利是否曾经作过什么评论。但是我确实记得，我还去和莫斯科的出版社最后摊了牌。他曾不断表示对我的书有兴趣，而同时又要求修改原稿。他总是说要出版，但总不签合同。这时他又要求我作“一些更多的修改”。我失掉耐心地回答了他：

“我就要离开这里到美国去了，没有时间一再重写。假如我的书里有什么你不想发表，我允许你把它删掉。但是我不允许你对我说的话增加或者改变一些

什么。你喜欢那一部分，你就出版那一部分好了。”

这还不能满足他。他接着问：“你是不是能在你出版的其他版本中也作同样的改变？”

“这可实在办不到，”我这样回答了他。我说我愿同意他把想要删掉的部分通知所有其他国家出版社。我甚至可以自己把这些变动的清单送给这些出版单位，并且告诉他们这些是莫斯科出版社所作的变动，如果他们喜欢，他们也可以照着办。“但是我不能把你们的变动强加给其他出版单位，他们的版本可能已经排印了。”看来，我这样说，他是不满意的。

这就是 1947 年底我要离开莫斯科，准备回到美国去时的情况。

## 2

### 在莫斯科被捕

1947年底，我在莫斯科乘飞机飞回美国，中途在巴黎停了下来。

在巴黎，我遇到了三位中国代表：刘宁一，他是中国工会的代表；陈家康，中国青年组织的代表；还有陆瑾，妇女组织的代表。这时中共还没有解放全中国，但是他们已经十分牢靠地占据了北满，就象我自己在1946年年底所见到的那样（那时我访问过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在巴黎的这三个中国人，正式代表着三个组织，也是中共在欧洲的主要代表。

1947年底的除夕夜晚，他们请我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饭后刘宁一正式向我说，在巴黎的全体中国代表的意见是，我可以马上回到中国去的时机已经到了。他说，“事情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他叫我到美

国去把我的书安排给一家出版社，并作完我的演讲，然后就考虑从莫斯科到哈尔滨，回到中国去。他说，在满洲有很多可供写作的材料。以后我还可以随军南下。这是我们之间的总的谅解。在此谅解之下，我在1948年初离开巴黎，回到美国。

关于那年冬天我在美国巡回演讲的细节，我回忆得起来的很少很少。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我在美国巡回演讲了那么许多次，要想把一次次都区别开来是困难的。我回忆得最清楚的是，1948年是这样的一年，在亨利·华莱士这个人的周围，很快地搞起了“进步党”这样一个联合战线，在这里美国共产党起了积极的作用，它在许多方面还起了左右一切的作用。那时我在帕洛阿尔托有一处住所，虽然我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度过的，但我在当地还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一个人。所以，我在进步党内起了积极的作用，被当作他们的代表去参加了那年春天举行的华莱士提名大会。

1948年又是这样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的妹妹同我断绝了关系，要我不再同她来往。她也住在帕洛阿尔托。自从父亲在西雅图死了以后，我就搬到了那里，为的是靠近她住。那时，自从我的丈夫在战争的年代里死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妹妹是我最亲近的人了。

我没有察觉出，在她看来，我可不是同她最亲近的一个。她有丈夫，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些孙子孙女。对于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比我亲。她同我说，她怕我的激进的名声有害于她丈夫的职业。很清楚，这只是部分原因，因为她的丈夫是当地一个学校的校长，就要领取养老金退休了。我的推测是，政治气候变了，以前我那个妹妹向朋友们介绍我是一位有名的旅行家和作家时，是感到相当骄傲的，这时却担心我的名声对她自己不但不再有利，而且要有损害了。早些时候，她很高兴地利用我在莫斯科的住处，让她的两个最大的孩子在从高中进到大学之前，都在那里住上一年，“以获得外国教育”。这时，这已不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了，因为，冷战日益加深，而在美国的阶级斗争也尖锐起来了。

我们那里的进步党的办事程序，在比较严肃认真的外国党看来，可能显得很随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选我作代表的那次会议，主席首先提问，有没有那一位出席的人有计划要到东部去，这样他或她就能够自费去参加进步党的大会。我说我正在计划到东部去，很容易去参加大会。但是不能答应回来作报告。因为我要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到中国去。如果我作为他们的代表去参加大会，我可以从东部写回一个书面报告来。这看来象是足够满足需要的了。于是全体一致选

我作了代表。我又回想起，当我在进步党大会的会场上站起来说几句简短的话，象每个讲话的人都被那样要求的一样，要求来作自我介绍时，我一说出自己的名字来，就引起了一阵不寻常的鼓掌。这时我才觉出来，由于我写文章，大多数进步党党员是知道我的，但是都没有见过我，当我在会场上站起来时，他们还不认识我呢。很清楚的是，他们见到我和他们在一起是很高兴的，我自己在那里也很高兴。

我是不是应该留在美国，参加竞选运动，它将直至11月才能结束，而这将着实推迟我回到中国去。我同美共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说，假如我在竞选中作为一个演说家或作为一个作家对他们有用的话，我就自愿留下来。他们说，他们很高兴把我作为一位演说家来使用。于是我就停留了几个月，直到我发现他们并不真正在使用我。

我耽搁在美国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还没有找到一家出版社来出版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最后，一位中国朋友说，我难于找到一家出版社的原因是，美国共产党对中国没有兴趣。他已经注意到，一年多来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没有一篇社论提到过中国革命。他没有再加什么推论，可是我一下子就推测到，这现象说明美共反映了我已经在苏联注意到的那种对中国的冷淡

态度。

于是我就去找一位党代表头头，直截了当地说：“我就要回中国去了。我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叫我特别要把中国的革命情况带到美国来。我是不是不得不去对他说，我已经把我写好的关于中国的书安排到七八个国家去出版了，但是唯独在美国却找不到一家出版社？”这个问题提得尖锐到足以引起行动。商量的结果，他们不能出版我的全书，但是愿意出版一本比原书薄得多的书，假如我肯把我的材料缩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的话。缩写所费的时间比写一本新书少不了多少。结果写成后定名为《明天的中国》，由“远东政策民主委员会”出版。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很费时间的。所以直到9月我才又在巴黎遇到了刘宁一，告诉他我将去中国，问他对于这次旅行有什么建议。我已经得到了去莫斯科的签证，但是纽约的苏联领事不给我去中国的过境签证，说这得在我得到中国的入境许可后再去莫斯科办。刘宁一好象对这很满意。他告诉我到莫斯科去要一张进入满洲的火车票。他说，中共还不签发正式签证，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全国政府，但是他可以给我开介绍信给满洲的政府机关，这足以使我进入边境并能去到哈尔滨。“满洲边境苏联海关一检查完毕，你就可以拿出这

些信来，叫他们打电话到那一边的海关。他们会让你过去的。”他并且补充说，“你可以把这些信给任何苏方管事的官员看。”他给了我两封信，都是用中文和英文写的。当刘同志向我告别时，他说，不久之后他自己也要到哈尔滨去，但是第一个到那里的大概是我。

\* \* \*

我带着这些证件，到了莫斯科外交部的新闻司，说明这次我来不是要他们给我办居住许可，而是要一个到满洲去的过境签证，因为我是路过这里到中国去的。新闻司的头头好象吃了一惊。他竭力主张我应该至少呆到11月苏联国庆节。他说，那时我会被邀请出席莫洛托夫的招待会，而我一定是想要去的。他还向我保证，“然后你的出境签证会很快地在三两天内办好。”

他问我是不是已经得到中国的签证了。我知道莫斯科仍是承认蒋介石的，我就笑着说，“你的意思是问我是不是从蒋介石的大使馆得到了签证？你以为在满洲那对我有用吗？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看满洲主管当局签发的去哈尔滨的证件。”我打开我的皮夹子，准备拿出这些证件来。

他摇摇手，笑着说，“请不要……”，意思是告诉我，他看中共发的证件是不合适的。我也笑了笑，表示我懂得外交礼节方面的规矩。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

他了。当我以后再去要求他办已经答应了的“三两天就可以办好的出境签证”时，据说他病了，我接触的都是新闻司职位较低，态度较粗鲁的下属人员，他们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拖延我的出境签证，但从不直截了当地拒绝我。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了。起初好象不过是办事拖拉。有一次我被告知，出境签证就要办好，可以去买下个星期的火车票了。我就预订了车票，把行李基本上打好，并准备了旅途上的食物。但是在答应好了的日期，签证还是没有下来。他们说，“这个星期不行了。”当我问什么时候可以办好时，他们又说不出来。“你能告诉我办不好的原因吗？”我这样问，可并不期待他们回答，因为拒绝的理由是很少说出来的。但使我奇怪的是，这次居然有答复了。我被告知，“满洲当局声明，满洲铁路上有土匪破坏，不准外国记者去。”奇怪，有土匪？不准去？后来经过我多方了解，我完全清楚了。当另一次他们又说满洲当局仍然说铁路上有“匪”情时，我立即回敬了他们：“什么满洲当局，你们是同蒋介石在西伯利亚的领事们商量的吗？”这使他们很恼火。我也一样。事实上，根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我是说到节骨眼上了。因为他们仍然正式承认着蒋介石，所有在苏联远东的中国领事馆，从伊尔库茨克到伯

力和海参崴，都是被蒋介石任命的人所掌管。这些人向蒋帮报告说，满洲铁路被“匪”所占，外宾不准来。对于苏联外交部，这就成为“官方的”了。

\* \* \*

我听说一个国际妇女大会将在布达佩斯召开，美国的一些组织想要我去参加；为了这，他们寄给我出席证书。我就告诉苏联新闻司说，除非他们能够答应很快给我办好去满洲的出境签证，否则我想去布达佩斯。我这样做，是有几种原因的。这次大会的价值是部分原因，还有部分原因是想看看我在莫斯科的名望是不是已经垮掉了，我是不是还能得到去欧洲的签证礼遇。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觉得中国妇女一定会派代表来的，我可以同她们接上头。我这一尝试是成功了。看来，外交部新闻司确实很高兴给我签证，而且还是呱呱叫的好签证，连去带回，都给签了。

我同一大群友好的中国妇女相会了，她们之中的一些人，过去我曾在延安或者别的解放区见到过。她们对我非常热情，邀请我同她们一起回到哈尔滨去；她们说，“我们通过苏联边境后，将有一列专车进入中国。”

我在匈牙利干了一件有生以来最轻率的事情。中国妇女邀请我同坐她们的专车以后，我连忙去打电话，

接通了国际线路，要到了苏联外交部的新闻司，告诉他们现在可以赶快办理到满洲的签证了。我说，中国妇女邀请我同她们一起去，她们在满洲有一列专车，用不着再担心“土匪”了。大会一结束，我就回到了莫斯科，没有参加任何一项匈牙利方面提供的游览，因为我要赶在中国妇女到来时能及时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自然，这毫无用处。以后，中国妇女经过莫斯科走了，我在民族饭店的餐厅里见到了她们，向她们祝贺，向她们告别。苏联的出境签证就是没有给我。以后苏联新闻司就只好越来越被我所烦扰。

\* \* \*

秋天以来，中共胜利的消息早就开始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中传播了。我每天在屋子里，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的中共胜利的消息。当我在城里走动，遇到记者拿着巴黎版的纽约报纸时，这些报纸也登着关于中共的，横跨八栏的大字标题新闻。

苏联的报上却一点也看不出来。我热切地想从它上面看到什么消息。我注意到，11月初在《真理报》最后一版“塔斯社通告”的标题下，出现了一条四五行字的消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称打下了沈阳。这意味着他们占领了整个东北。我寻找社论，可是没有。我继续认真不倦地注意看报纸。直到12月6日，在第四版

的塔斯社通告栏下，出现了一条略长的六行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长江以北国民党最坚固的设防城市徐州被攻占。”

华北已被中共所攻占！在莫斯科的报纸上依然没有社论出现！

在外国记者和外交界人士当中，流传着种种疑问。苏联报纸在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面前这样沉默是什么意思？他们通常的论调是斯大林好象不喜欢看见中共胜利。这个观点我不能接受。我从我丈夫家里的人那里知道，莫斯科工厂里的工人是懂得打下徐州的意义的。他们在工厂集会上庆祝这个胜利。我向俄国朋友们询问，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给了最能使我接受的解释：“我想是由于我们对中国形势的分析，正在高级领导层中重新审议，所以在此期间，报纸保持沉默。”

这时我不断接到世界各地的来信，督促我向着到中国去的目标加速前进。纽约美共的一位党员来了一封信，我看出它反映了美共的正式意见。信是这样写的：“我们觉得这是你的不幸，也是我们大家的不幸，你被阻在莫斯科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希望你马上就到中国去。”另外一封从布拉格捷共新闻处的头头来的信里说：“把你从中国写来的文章副本给我一份，我将把它在捷克报纸上发表。”上年我从中国回来后，伦敦路透

社曾发表过我的一些文章，这时又要我从中国前线给他写连载文章。到处都承认世界上最重要的新闻正来自中国。我的中国朋友邀请我去采访，但是我却坐在莫斯科，从收音机里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我觉得我辜负了世界上那么多的地方对我的要求。我继续不断地向苏联外交部新闻司以及其他我认为或许可以有所帮助的机构提出要求，但是都毫无用处。

我回忆起这个时期有两件事或许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关。我这时仍然向莫斯科的出版社施加压力，它曾经同意出版我关于中国的书，但是它却仍然犹豫不定。一天，迈克尔·鲍罗廷在我的面前给他们打电话，他为了我同他们争论。我突然听他说，“他们正在打胜仗，不是吗？这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对的吗？”这话使我吃惊，直到这时我简直还没有想到过，会有共产党人当真地认为中国的“理论”错了。另外一件事发生在首都大旅馆的客厅里。这时我的处境困难，在莫斯科的外国人当中，简直是众所周知的事。一个知道我的处境的外国记者告诉我，俄国人可能把我看成了一个铁托分子了。在上一年里，苏共和铁托间的争吵发展得很尖锐。我认真地听了这条意见，想了又想，回答他说，“不，我不认为我可以被叫作一个铁托分子。我自己并不怎么懂理论，我曾经认为双方在处理争端上都

有错误。不过，在我看来，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上，南斯拉夫是可以牺牲的，而俄国人则不能。所以我紧靠着俄国人。假如一旦要在他们和中国人之间来选择，答案可能就不同了。”这是我后来关进牢里想起来的一段话。那是一间大概很容易装有录音设备的屋子。

最后，在1949年1月的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天津和北京，苏联报纸打破了长期以来对中共胜利的沉默，对于中国内战，发表了长篇社论，而中共的胜利这时已经继续了三个多月了。这时我再一次希望得到批准我去中国的出境签证，我再一次面对着一场顽强的斗争，它从来不是断然的拒绝，而总是无止境的拖延。

\* \* \*

最后，二月里的一天，我去访问曾对莫斯科报纸长期沉默作了最好解释的那一位俄国友人，他告诉我：世界工会联合会已决定下次会议要在今年五月的某个时候在北京召开。我在大大激动之下，问他是在哪里看到这个消息的。他回答说，这消息曾在《劳动报》上登载过；他告诉我登载的日期。显然，这消息并没有出现在《消息报》或者《真理报》等官方大报上。

当天我拿到了我自己的那份《劳动报》，并仔细地读了它。这个通告是很清楚的。世界工联下次会议，

将于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我仔细考虑了这有什么意义。首先，它说明中国工会将准备接待经西伯利亚铁路从欧洲来的大批代表，路过哈尔滨，直到北京，这表示那里的铁路不仅不怕任何所谓的“土匪”，而且已经可以提供舒适宜人的旅行便利了；其次，它表示，作为中国工会代表驻在巴黎的刘宁一，一定就要到莫斯科来安排大批代表的运送和签证；最后，由于刘宁一曾经邀请我回中国，而我又有美国“劳工联合新闻社”的证件，刘宁一将会有充足的理由为我安排签证的。

我经过仔细考虑，并查对了世界工联在巴黎会议的闭幕日期，确定刘宁一很快就可以到莫斯科了。于是我就去中国代表以前曾在那里住过的民族饭店，尽可能随便地问了一下房间管理员：刘宁一同志是不是已经从巴黎到了这里。因为在我这方面，不能显露出丝毫缺少把握的神态，否则旅馆就会拒绝透露旅客的情况。我这样问了以后，给我的答复来得同样随便：“昨天晚上我们等他来的，但是从布拉格来的飞机没有到。今晚可能会来。”我回到家，对于我猜对了这一点很得意，并考虑下一步如何能最巧妙地见到刘宁一。他毫无疑问一定会忙于同苏方官员安排即将来临的旅行细节。我决定直接去到他的房间，但是并不期待他能接见我，因为他很可能忙着别的事情。所以我得留

一封信。我非常仔细地写了这封信。我告诉他，我等待苏联的出境签证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由于他曾建议我去中国，所以我仍然在等着，仍然在催问苏联的出境签证。不过，我觉得在莫斯科是浪费时间，在这里中国的消息一点也没有。也许借北京即将召开世界工联会议这一机会，他可能帮我弄到签证。如果不能，我认为我应该回到伦敦，或者也许美国，在那里至少我可以在我过去访问的基础上，根据一般世界新闻来写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拿着信回到民族饭店，问了刘宁一住的房间号码，直接到了那里敲门。他的一个同事开了门，我看见刘本人在屋子里正同一个俄国人讲话。他的视线和我碰到了一起，他先是微笑了一下表示欢迎，然后关切地看着我，我理解它的含义是他不想被人打断。我晃了一下我的信，递给了开门的那个人。刘对这赞同地笑了笑，门就关上了。几个钟头之后，刘宁一的译员打来电话，为我约定了去见刘的时间。

这时，我觉得很轻松，并相信只要和刘宁一谈一谈，就可以确定我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我准备离开莫斯科了。也许刘能帮我去到中国，或者我得回到伦敦，也许回到美国，然后再走别的路线到中国去。

第二天，我到外交部新闻司，要他们给我办随同筹

备开会的世界工联人员去北京的出境签证；而且说，我已约好刘宁一次日上午见面详谈一切。后来我觉得至少我说这些话的胜利的语气是不合适的，而且很可能还促使他们迅速采取行动。

\* \* \*

1949年2月14日，晚饭后我马上就上床睡觉了，感觉很疲倦，也很轻松。当几下重重的敲击落在我的卧室门上时，我已入睡了。我以为是哪一个朋友来了，门敲得这么狠，大概是对我的早睡表示善意的抗议吧。我披上了一件晨衣，走向房门，半睡半醒地把门打开。

两个穿着制服，带着随身武器的人，大踏步地走了进来说：“马上走，你被捕了。”

我开始一半迷糊，一半清醒地抗议着，说他们一定是走错地方了。他们却说，“赶快”，指着我应该穿上衣服。我一边穿衣服，一边还继续争辩着。他们告诉我，要带着换穿的内衣和其他日用必需品。我简直不能相信夜间就得离去。我觉得只要我一接触到任何一个当权者，他马上就会放了我，因为捕错了。我在糊里糊涂当中搜集起来的一些衣服，都是不适宜于穿用的。不过我倒是拿了我的钱包，里面已经装着我的护照和外币，并扔进去一些我一向吃的维生素药丸。当我走过住房的前厅时，从餐室开着的门望进去，看见我丈夫的

姐妹用围裙掩着脸。在另一头，在厨房里，我看见第三个警察看管着电话，防止这座楼房同外界沟通消息。

我想这一定是什么匪徒在进行绑架。这些人不象是苏联警察。可我又看见了黑色的大汽车，那是莫斯科高级官员，特别是保安警察所特有的汽车。他们开了车门，我进到车子里去。他们不用手铐，只要我服从命令，他们连用手碰我都不碰。不过很清楚，假如我抗拒，他们是要强迫我的。这样，我们就来到卢比扬卡中央监狱，我认出了这是苏联保安警察的可怕的监牢。

# 3

## 监狱里的五天

**我**期待着一到监狱，就会面对着一个掌权者，他会知道我为什么被捕，说不定还会立即承认是弄错了。但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监狱里的例行手续使我不再这样想了。这我本来是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在侦探小说里读到过，很快就看出来这是例行手续。我被引到一间小屋子里，那里一位女医生吩咐我脱光来一个彻底检查，这并不是要检查我的健康状况，而是要检查我有没有可能携带着隐藏起来的文件，武器或者什么准备在审讯受刑吃不消时用来自杀的致命药丸。这不仅包括检查体表，而且还要检查有洞的地方，以防里面藏着什么极小的东西。那位医生，在彻底检查中考虑得很周到，要不然就是过分挑剔。她很少用手碰到我，而是吩咐我自己用手指弄开她想用眼睛检查的地

方。同样，去掉鞋带（这大概是防止犯人自己勒死的例行做法），之后她又仔细地望着我，象是觉得我还不会干出那种绝望的行动，她把鞋带还了我，说：“系上鞋带你会感觉得舒服一些的！”我穿上了鞋子，系上了鞋带，果然觉得好一些。我马上问那个医生，为什么把我弄到那里来，但是很显然，她是不知道的。

接着我又被带到一间房子里去，那里有位官员坐在办公桌后面，象是很有地位似的。我问：“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他只是挥手要我坐到椅子上。我很快看了出来，他大概是个什么监狱管理员，负责安排我的牢房，但是对于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的健康状况。这使我怕了起来，怕会不会要我干什么重体力劳动，也许会把我弄到北方森林里的集中营里去。于是我小心谨慎地回答说，根据我的年龄来看，我的身体还算是好的。他问我需要不需要什么特种饮食。起初，我作了否定的回答，后来我想起来有一次休假，在一个苏联的疗养所里，他们让我吃一种所谓“牛奶—蔬菜食谱”，我把这告诉了他。他又问我需要什么特别药物？我回答说，我吃多种维生素，并不经常吃别的药。他要知道吃的是什么维生素。我说我带来了我自己吃的维生素，那是混合起来的多种维生素。我特别需要复

合维生素 B，它对我的神经有好处；我知道我将会神经紧张。所有这些问题使我很意外。

然后我被带进一间狭窄的房间，好象是在监狱的四楼上。前进的道路使我心慌意乱，长长的楼梯都是那样覆盖着重重铁丝网，如果有犯人想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他只会滑下铁丝网，在底端被截住，也许会受伤，但是肯定死不了。这种景象是会使人神经不安的。不过我被带进的那间屋子，更象是一间便宜的地方旅馆里的房间，而不象是牢房。有一个真的帆布床，很窄，不很舒服。不过，高高的窗户上面装着铁栏杆，显示这确实是牢房，而且天花板上装有总是亮着的，可由牢房外边控制的灯光，使卫兵能够日夜随时从房门上的小洞看到我的一举一动。由于已经过了午夜，我很快就进入乏透了的熟睡之中。

第二天早晨，我的早餐来了，我意外地看到其中有我吃不了的大量奶制品，不仅一大玻璃缸牛奶，还有一大份奶酪。这是一顿我远远吃不下去的早餐，但是它缺少我最想要吃的咖啡。我开口要了，结果给了我一杯很淡的咖啡。然后我又要来了第二杯。送饭的人又拿上来另外一个杯子，放在我的桌子上，骄傲地说，“维生素”。从那芳香的气味来看，它象是用松针做的维生素 C；我曾听说过，这种维生素的重要性，在列宁格勒

被围困时曾被人们所了解；当时许多人死于缺乏蛋白质的饥饿，但是却没有缺乏过维生素 C 因而受苦；在那里这种维生素是用公园里的松树做的。我一直没有得到我要的维生素 B。他们也不退给我自己储备的那种维生素，大概那些胶囊里装着的东西，照例是要被怀疑的。不过，我还是由于这些维生素 C 而精神恢复了起来，特别是由于它所显示出来的对我的照顾。

我的精神也为牢房门后面印着的字句所影响而振作了起来。其中一条劝告犯人“要对警卫有礼貌，假如他们也要警卫有礼貌地对待他们”。这显示出残暴并不是监狱里日常必不可少的东西。另外一条告诉我，犯人有权利每天在屋顶上散步一次，只要天气允许，他可以敲门叫警卫来让他出去散步。我享受了这一许可的好处。我很快就知道了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屋顶，被用高墙分隔成好几部分，在每一部分一次只许一个犯人去散步。我什么时候都看不见别的犯人；别的犯人也看不见我。带武器的警卫站在更高的地方，从那里他们可以看见每一个人。在从过道到屋顶我所要走的一路上，也都得遵守这样的规矩：如果我们遇到另外一个被警卫跟着的犯人，只要一发觉他们要来了，我们就退进一个边道里。很清楚，这是卢比扬卡监狱里的一项狱规：犯人不得相互看见。

直到第二天，我没有遇到一个知道我的案情的人。已是夜间很晚了，一个卫兵来告诉我：“政委要你去。”我被带到楼上的一连三间的大办公室，各有一两个下属人员坐在外面两间屋子里，我们经过那两间屋子，进到一间放有一张长会议桌的屋子里，在会议桌的一头，坐着一位神色严厉的官员，另有一位显然职位较低的人，坐在桌子的一边，手旁有一堆纸张，显然是准备作记录的。

我马上提出来问：“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那个“政委”（他的确切职位和姓名我一直都没有听说过），不理睬我的问题，指着一张椅子，叫我坐在正面对着他的桌子的另一端。“我要来提问题，”他说。

他开始问一些照例要问的问题，如我的姓名、国籍、职业等等。很清楚的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他还怀疑我的国籍，拒绝相信我所说的我的职业是个作家。他说：“不，你不是。”我坚持着说：“是，我是。”他再一次肯定地说：“不。”

“那么是什么？”我问。

他回答说：“是个记者。”

我解释我既是好几个通讯社的记者，又是一个写书的作家。目前我主要是在写书。

“把它记下来，她是个记者，”他命令着。我同意

了。我的心沉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在莫斯科共产党人的理论中，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记者，特别是为外国资产阶级报纸写新闻的记者，则被认为是“二等间谍”。这样说，也许有点道理，因为记者往往揭露当局要掩盖的事实。不过，这样的含义是不能使我愉快的。

审问者继续问我在苏联的旅行，我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的，我来访问过多少次，我到过哪些地方等等。我回答说：我记不清我来过多少次了；因为我是1921年第一次来的，把莫斯科当作我的家已将近三十年了。我不断往返美国去演讲和写书，并且来去走了很多不同的路线。我列举着我一次一次的旅行，他越听越惊骇起来。苏联外交部允许我看了那么多的地方，显然把他吓坏了。我在他的身上觉察出麦卡锡的气质，他毫无疑问地认为我是有罪的，他很得意地证明了苏联外交部如此疏忽大意，它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制止过我，这正象麦卡锡想办法要证明美国国务院的疏忽大意一样。

我回答的这些话都说得很自然，我希望有机会能回问一些问题。但是没有允许。关于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这个问题，我没有再问他就回答了。那个“政委”站了起来，显然是为了要突出他的判决的重要性，

他大声地说了一些话，以期把我压垮。但我只是用询问的眼光看着他，他恼怒地说：“你懂我说的是什么呢？”

我说，“我懂得你说我是间谍，可是我不是。此外，别的话我都不懂。”

他再说了一遍，用了一句专用语，意思是我不仅要“被送出这个国家”，而且要“被驱逐出境”，以示有罪。直到这时，我一直期待着某种审判或者至少是某种正式讯问，不仅提出指控，还允许我反驳。但这很显然是不准许的了。不过他说，我可以提出愿意在何处边境被驱逐。一刹那间，我心里以为他们终于让我去中国了，于是我就要求到满洲边境。但是我被粗暴地告知：只许在一个西部边境。当我选择华沙或者布拉格时，他们感到很意外。后来我想到他们是企图要发现“间谍”所选择的路线的，预料我会选择芬兰，因为它对苏联不友好。那时我心里想的是，华沙和布拉格的党政领袖我都很熟悉，只要我一能行动自由，不再被警察拘留，我就在这两个“友好国家”之一停下来，立刻打电报给斯大林解释并要求申诉，甚至再试图通过苏联到中国去……这时我甚至还使自己相信，审查我的人一定已经发现我没有犯罪，他们只想把我摆脱掉，甚至连我的被捕也还没有向世界宣布呢。可是，到了华沙我才

知道，我的这些想法错到了什么地步。

我在监狱里一共呆了五天。时期显得很长。长得使我过多地思索我被捕的可能原因，长得使我过多地想象拘留我的意图。在那种同所有的报纸和外界联系都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建立起完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而只有逻辑结构的纯粹空想。

这些天他们到我的住处，拿来一些没有经过很好挑选的内衣和其他衣服，并从我的文件卷宗里拿来一大批信件和笔记。在最后两天，每天晚上我都被带上楼，花费好几个小时来辨认我那文件卷宗里的材料，并一件件签字认定。各种各样的信件和笔记一点次序也没有地传给了我，可是我对这些记忆犹新，因为我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来整理我的文卷，以便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运往中国。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文件的选择一点道理也没有。我本来还希望我的文卷真能全面地被检查一遍，这不仅会显示我无罪，而且还可以看出我花费了几十年的工夫，写出了很多关于苏联的好材料。这时我在许多我原先为《莫斯科新闻》到苏联各地采访用的，早已忘记了的旧笔记簿上写上了“我写的，属于我的”等字样，并签了名，写上日期。其初我这样写着，我还认为这些东西的确可以证明我为苏联的一个报纸做过很好的工作。可是这种自信很快就被一件小事情

给打消了。他们拿来一封我本来早已忘记了的信，那是美共一个党员写给《真理报》的，告发我犯了某种罪行。《真理报》把信转给了迈克尔·鲍罗廷，他是《莫斯科新闻》的总编，那时我在为这个报纸工作，于是他就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回忆起来我被指控的是在某一城市作过一次演讲，粗野地攻击了苏联。实际上我并没有去那个城市，而且那时我已经离开了美国，那个城市请去演讲的是另外一个人，当地报纸把他的话栽到了我的头上。这些情节都是很容易证明的。我已经满足了鲍罗廷和《真理报》的要求。我清楚地记得，几个星期前整理我的文卷时，我找到了控告信和答复它的文件，并把它们别在一起，来表明原控告是美国报纸上的谎言。这时我发现他们只取来了给《真理报》的原控告信，却抽掉了所有否定它的证件。这样我就知道了，没有疑问的是，我的文件并没有被老实地检查过，检查文件的人只是为了要在文件里找出可以作为我犯罪的证据。从这一点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即使是我那些为《莫斯科新闻》而去斯大林格勒和库茨涅兹采访用的笔记本，也是可以不顾写作的日期和当时的情况而被用来证明我的间谍罪行的。因为斯大林格勒和库茨涅兹已经成了充满秘密的国防工业中心了，但我访问的时候，它们正在建设中，是很愿意被当作社会主义成

就的榜样而由报纸公诸于众的。

于是我的希望破灭了。不象有什么公正的意图。只有那些可以歪曲地来证明某种罪行的材料才被找了出来。

即使是这样，苏联的作法，就我所感到的，并不制造任何证据，他们只不过是寻求可以用来显示犯罪的东西，并把任何可以作为反证的证据清除掉。我注意到这一点以后，就开始在签名承认我的文件时，同时加注在什么时候或者给谁写的等等说明。这使得“政委”很恼火，因为，举例来说，如果注明我收集的关于斯大林格勒的资料是老早在战前收集到的，就使得用它来作为犯罪证据变得无效的了。于是，他就只许我写“是我写的，是属于我的”这些字样，以及我签字的日期。不过，他并不能完全如愿以偿，因为他并不是总呆在屋子里的。

第二个管事的人，他被我叫做“秘书”的，象是和气得多。我知道，这类机关的通常作法是并用两种人，一个粗暴，另一个和气，来诱使罪犯把拒绝告诉粗暴人的事情告诉和气的人。即使我对这已经完全清楚，这种方法也还是会很有效的，因为对于在监狱里被剥夺掉同外界一切联系的人，即使是一点点宽慰，也可以成为不可抗拒的诱引吐露真情的力量。可是，我没有什

间谍活动可以交代,我只是利用“秘书”在场的时候来编排我的文件,使得它在形式上可能显示的罪行要比“政委”所想望的轻一些。这样做,即使当时没有什么效果,也许以后可以被那些重新审查这案件的人看见,也许多少年以后,可以成为平反的一个因素。

\* \* \*

在第五夜里,我在文件上签了好几个小时的字,已经疲劳不堪,政委突然宣布我要立刻被驱逐出境了。我被告知“赶快把衣服装好”,连一个小时也不让我睡,我就得走了。我抗议我整夜没有睡,一连几夜也很少睡。可是,管我的人很执拗。他们说,“医生会检查你的身体的,并且会决定你是不是适宜于旅行的。”我知道监狱里的医生是怎样处理问题的,我很少希望她能给我一点休息。我到狱里来时对我很和气的那位女医生,这时肯定地说我“适宜于旅行”。他们给我送来了两只大衣箱,那是警察从我的住处装了来的,我连重新装一装的时间都没有。

我被告知,我可以带着我的美国货币走,但是所有苏联货币和在苏联的财产都必须留下来。我可以指定任何我挑选的苏联公民来承受这些金钱和财产。于是我就开始为这来开名单。接着我感到,我的任何赠与都会牵连接受的人,所以我只说,我的银行存款应该转

移给那些当我不在时有权收款的人。许多年后，我听说这些人拒绝接受我的钱，那些存款依然在我的名下，没有动过。

在最后的时刻，当我单独和那个我叫作“秘书”的、比较和气的人在一起时，我求他可不可以给华沙打个电报，为我在外国人常住的旅馆里预定个房间。我提醒他，我在监狱里睡觉很少，已经精疲力尽，这时去华沙，又要走很长一段不能睡觉的路，而华沙那里的旅馆又非常挤。他说他可以问问看能不能做到，但是他不给我任何允诺。

在早晨走过莫斯科的街道，清爽的空气扑在脸上，上升的太阳照耀着克里姆林宫的塔顶，这使我感觉精神在恢复，甚至于使我振奋起来。我一边向着那些尖塔挥手，一边想着：我是会光荣地回来的。

# 4

## 被驱逐出境

**我**由卫兵陪着，汽车飞快地向着莫斯科机场驶去。在机场，让我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吃早餐。很显然，我看不见别的旅客，也不能被别的旅客所看见。我们乘的是一架小飞机，只能坐八到十名旅客，机上的人都是卫兵或他们的家属，他们对我一点也不注意。坐这样的小飞机上下颠簸，我觉得很不舒服，但还想稍为打个盹儿，因为已经疲乏到了极点。最后我们降落在一个开阔的地面上；在那里我被换上了汽车，后来又换乘一辆小吉普车，里面有一个司机和两个卫兵。这样，我终于到了波兰边境。那是一处荒凉的边境，在那里两国被一条小河隔开，河上有一座破桥，桥又倾斜，又不稳，吉普很难过得去，只有步行还可以。

在一个哨所前面下了车，两个卫兵提着我那很重

的箱子走到桥中央,放在那里,我跟在后面。他们把我的护照和装有我的美国货币的皮夹子递给了我,然后离开了我。一个相当困惑不解的哨兵从对岸向我走来。我急忙打开护照,发现里面有波兰的签证。当他来到时,我就给他看。他拿了护照,用俄语对我说,他得拿给他的上级去看。接着他就走回波兰的哨岗。等了一会儿,他同一个他的上级军官一起走了过来,问我要到哪里去。我回答:“华沙”。然后我被告知,去华沙的火车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要从不远的一个车站开走,他们可以用给他们装煤的卡车把我送到那个车站去。

那是一个小小的火车站,没有兑换外币的机构,不过他们接受了我的美元来付车票,并找给了我一些波兰钱,我用其中一部分付给了卡车司机。海关人员里里外外搜查了我的行李和我的全身,他们对于我这样古怪地来到这里好象迷惑不解。这使我更相信我在监狱里已经形成的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推测,我相信苏联当局已经知道他们是搞错了,逮捕了我使他们很不好意思,他们是不会把这事宣布出去的。这很好,我也对此保持沉默。不过,我的遭遇还是使我很紧张,很神经过敏,忐忑不安,我发愁会不会由于我没有正常地将美元兑换成波兰钱而使我坐进波兰的监牢。

当我到达华沙时,天色已经很晚了。我坐了一辆

出租汽车到旅馆。拿出我的护照，我问旅馆的管理员是不是给我预定了一个房间。他查了他的记录，要我在两个房间中选择一个。我不知道这是机会碰巧，还是莫斯科给我预定的。我太累了，顾不了这些，我只想睡觉。不过，房间管理员已经使我不能安定下来，他告诉我，我的波兰签证是个过境签证，第二天就要到期。

我不想马上就离开波兰，我想停一停，同政府的头头们联系一下，不几年以前，当他们的政府在卢布林形成时，我同他们很熟识。不过，第二天是星期天，所有机关都关门。我不知道可以找到谁来帮助我。我想起了“电讯新闻社”的头头，那是一位嫁给了一个波兰共产党员的英国妇女。这时，“电讯社”是一家进步的国际新闻社，我也为它写作。几个月前我路过华沙时，我们曾互相拜访，我并且留给她一些不能带出国的波兰货币。我知道她的住处，也不怀疑我可以在星期天的早晨在她的家里找到她，她是马上就可以给我帮助的。

当第二天早晨她开门时（我早在八点钟左右就去找她了），她一看到我就满脸吃惊和害怕的样子，使我立刻意识到莫斯科已经宣布我是个间谍了。“快进来”，她说，“快告诉我。”她向周围的街上看了看，看见视线里没有人，她表现得轻松了一些。她告诉我，她将让我小心地走出去，而且我不应该再回来。

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补充说，我仍然不知道逮捕我的原因，因为审问我的官员好象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并且拒绝承认我是个作家，却谴责我是个间谍。我又说，我肯定这是搞错了，我要在波兰停下来去见当局，并打电报给斯大林，把情况搞清楚，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到中国去。她回答说，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我本来从她的神态中，已经开始对我原来的想法怀疑起来了，而她这样一说，更使得事情格外清楚了。

“你在东欧的声誉，完全是来自你以前在莫斯科的声誉。波兰或东欧的任何一个国家，是都不会有人能够或者肯定为你的这个案件帮一点点忙的。只有美国共产党，在四十年以前你还没有去莫斯科时，他们就了解你，有权利也有义务来处理你这个案件。但是美共又是那么奴性十足，你是没有什么指望的。”

她的分析是那么清楚，我立刻接受了关于东欧的那些说法。但是我又反对她那关于美共的说法。事实上，当我知道了莫斯科已向全世界公布我已被当作一个间谍驱逐出境时，我就必须立刻回到美国去告诉美共我所发生的事情。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同时也是为了他们。我们可以共同商量该怎么办。

“我不认为美国党象你说的那么奴性十足，”我回答说。“我承认美共不论是谁，都会接受莫斯科警察当

局所说的反对我的话的。但是，如果我告诉他们审查我的官员拒绝承认我是个作家，他们从我的卷宗中搜集起来的所谓证据包括了我在苏联的所有旅行和我的全部著作，我想他们至少应该同斯大林一同来查看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管怎么说，我同意我的首要任务是向美国党报告，越快越好。

我的女主人说，她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同波兰同志联系，并提出我的处境，看他们是不是愿意做点什么。她要我这时呆在里面的那间卧室里，不管谁来敲门，都不要答应。后来她回来报告说，她去找的波兰同志肯定了她已经说过的那些话。她要我不但不再找她，而且也不要同任何在欧洲的“电讯社”记者接触。“我们是一个新组织，还有待证明我们是个进步新闻社的价值。和你的联系会连累我们全体。”

我实在是疲劳不堪，又加上离开波兰的种种技术困难，不过它们本身并不紧要，它们起源于我的签证有效期只有一天，而这一天又是星期天。当我试图延长签证时，我发现这需要一个高级机关的介绍，可是所有机关星期天都不办公。现在，我回忆起来那时我坐等几个小时打电话，好不容易才接通了某个重要人物，并让我绝望地说：“如果你愿意，就把我关到监狱里去，但是得给我一个在夜间到什么地方去睡觉的机会。”对于

这，我得到了心平气和的答复：“我们不愿意把你关到牢里去，因为你没有破坏波兰的法律。我们要帮你离开这个国家，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愿望。”于是我的签证得以延长了一天，并在到巴黎去的飞机上预定了一个座位。同时也使我想起，在这些国家里，从前我曾是极受欢迎的作家，而这时我却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避难者了。我利用在华沙的机会，重新整理了我的行李，装了许多书，很沉。我不可能带着这些上飞机，于是我就把这些书留给了一家以前欢迎登我文章的报社，要求他们给我寄到美国去，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寄来。

\*             \*             \*

我直接飞到了巴黎，听说去纽约的飞机几个小时之内就要起飞了，这时我的眼睛牢牢地盯着纽约。因为我曾被警告不要同“电讯社”或者任何别的友好组织接触，同时我也想要回避任何地方的美国大使馆，或许它正在注意我的到来。如果同它接触，不正好证明我是一个间谍的罪状了吗？我在靠近飞机场的一家旅馆里休息了几个小时，没有进城。买飞机票时，我要求保证不公布我的名字。售票员答应了，但是我的名字却很快就传了出去。我们在纽芬兰的甘德<sup>①</sup>停了一下，

---

<sup>①</sup> 甘德：横跨大西洋飞行的一个起落站，在加拿大东海岸外大西洋里的纽芬兰。——译注

这时流传说我就在这架飞机上。

1949年大西洋公司的飞机不象今天那样的快。这时坏运气还是跟着我。一阵风暴远远地把我们赶出了航线。在精疲力竭的飞行之后，当我们到达甘德之前，我们几乎飞到了亚速尔<sup>①</sup>。飞机上的女服务员，看见我疲劳得实在不行了，为我安排了一个双人座位，使我可以躺下来。在到达甘德前，我问她可不可能让我停下来睡一夜，然后乘下一班飞机继续飞。她回答说，能够这样安排。在甘德，我见到了两个新闻社的电报，要我给他们回个他们付费的电话。我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我很小心地给他们写了同样的答复，我说，“不要利用我的被捕作为冷战材料。我不知道为什么被捕，或者为什么他们不公正地把我叫作间谍。不论哪个国家的警察都会犯错误。”

在一个公共电话间里，我对着电话念了这一段电文。电话间的门猛被拉了开来，闯进来了一个人。他说他是赫斯特国际新闻社的记者。为了向我采访，他特地从纽约赶来甘德。我除了准备的那段电文之外，拒绝再说什么。我决定，除非我知道了外界关于我已经在说些什么，或者最好是我已经同朋友们商量了，在

---

<sup>①</sup> 亚速尔：在大西洋里属于葡萄牙的一群岛屿。——译注

这之前我什么也不说。可是这个人是这样莽撞，而且那样执拗，很明显，如果我在甘德过夜，他甚至不会让我一个人在床上的。我要变成了赫斯特的“独家新闻”了。我厌倦地走出电话间，上了飞机，向女服务员解释了我的处境，继续飞行。赫斯特记者同我一起飞。他利用了我那双人座位，坐在我的旁边，于是我就再也不能休息了。我离开了他，又向服务员要了一个座位，那里更挤，但是他不能再坐到我的旁边。这之后，他还是把身体倾斜过来，想法子继续讲话。这样，我们就在那第二个不眠之夜的午夜以后，到达了纽约。

当别的旅客下飞机的时候，服务员要我等着，我还以为她大概是照顾我，给我一个单独离开飞机的机会。我的幻想马上破灭了，当我一下飞机的梯子，就遇到了两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把一张传票塞进我的手里。那是要我在十点半去见大陪审团，如果不到就要受罚的传票。过了午夜，同时就是早晨，这时已经是凌晨了。接着我被带到移民局的官员那里去，他们扣住我的护照，用冗长的讯问企图证明我已经不是一个美国公民。他们的这个意图失败了，因为我一向是很小心的，许多美国人在苏联的选举中投票，我可从来没有干过。我从来没有对任何外国政府发誓效忠，我从来没有担任过只有另一国家的公民担任才合格的职务。总之，他

们要证明的事情没有成功。

我最后被领到机场大厅里时，已是早晨四点钟了，那里有一百多个新闻记者和电影、电视摄制人员，不耐烦地在那里等着采访，已经等了一夜。当时我说了一些什么，我大部分都忘记了，不过有些小事情还记得很清楚。我首先问他们是不是已经看见了我从甘德发出的声明。他们回说，已经看到了。我就向他们保证，除此之外我没有再对任何别的记者作过别的声明。对于这，赫斯特记者叫了起来，“那是说谎。从甘德来到这里，我同你谈了一路。”我回答：“你想要同我谈，纠缠着我，不让我休息。但是我没有告诉你什么。”

他叫着说，“在监狱里他们不是待你很坏？”我激动地回答：“没有象你(们)在这里这样待我的一半坏。”一个在我背后的妇女低声告诫我：“不是我们全体，请不要说我们全体。”我吃了一惊，我要把美国整个新闻界当作敌人攻击起来了。于是我回答：“不是你们全体，我只是指从甘德来的那个不让我休息的人。”这以后我听见赛卓克·贝弗莱吉在我的旁边说话了(他是《国民前卫报》的编辑，我也在为这家报纸工作)。他向我肯定地说：“等这里完了以后，我带你到纽约的一个私人家里，那里没有人会打扰你。”这以后，我尽力来回答好问题，我说没有被粗暴地对待过，但是被不公正地控告

了，我认为那是一个错误。这样的错误不论在哪个地方都是同样被“冷战”的气氛所鼓舞。

这是我那时的观点，我现在仍然基本上保持这个观点。这并不妨碍我想要知道我被捕的真正原因，而这原因我还一直不知道。

\* \* \*

当我们到达《国民前卫报》的一个支持者的家里时，已经快要破晓了。我精疲力竭，而又过于兴奋得不能睡觉。我被命令于十点半去见大陪审团，目的何在，又不清楚。因为我从赛卓克那里听来，这就是最近控告美共一群高级领导人的那个大陪审团，看来他们显然是要利用我来找到美共与莫斯科有联系的新证据，或者，如果我倔强不屈的话，就提出什么来控告我。我觉得我至少应该先同美共联系上，再到大陪审团那里去，以便能够听到正在建议中的方针：例如，是否运用“第五修正条款”<sup>①</sup>所给予的权利，使自己不至于在证词中陷入法网。

我决定打电话给我通常总是通过他来和党打交道的那位美共党员，特别是在我到中国旅行期间，我是通

---

<sup>①</sup> “第五修正条款”(The Fifth Amendment):美国宪法的第五修正条款规定，在刑事案件中不得迫使任何人成为他自己犯罪的见证人。——译注

过他来与党联系的，就是他，曾经急切地写信对我说，“我们觉得这是你的不幸，也是我们大家的不幸，你被阻在莫斯科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希望你马上就到中国去。”我设想这个人的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都是会被窃听的，但是我相信，如果早晨八点钟打电话到他家里，并且不说我的名字，被窃听去的危险要小一些。

于是我要求在略为休息后，早晨八点钟就把我叫起来。我打电话接通了在家里的这个人，他立刻就听出了我的口音。我说，“你大概知道今天上午十点半我有个紧急约会。”他回答说他知道。我说我去以前必须同朋友们商量商量。我问是不是可以立刻到他家里来。他回答说“不行，他要到我所在的地方来。赛卓克给了他住址和电话号码，他答应在九点半以前来。我们等着，可是他一直没有来。到了十点半，我已经可以扣上“藐视法庭”的罪名了，而且再加上这样的事实：前一夜我曾经告诉过联邦调查局我想去住的旅馆的名字，可是我并没有去，这就可能被认为是回避，或者是要逃跑的真实企图了。”“现在你显然需要一个律师了，”赛卓克这样说，我也同意。在赛卓克的建议之下（据说那位没有按时而来的美共党员后来也同意），我们决定去找奥·约翰·罗杰。他是前些时曾到大陪审团受审的那些美共领导人的律师，所以他对于他们所采取的立

场和使用的方法都应该很清楚。

当我在约定时间去罗杰先生的事务所时，我已经请一位医生检查了身体，他看到我的状况很震惊，对于我让自己搞到那样疲惫不堪的境地，好好教训了我一顿。当他听到我的处境时，就给我写了一张证明书，说我必须卧床休息，完全不得外出。这对大陪审团是有用的，但是还不能阻止我去找我的律师的事务所。我为罗杰先生的一位同事所接见。他说明在罗杰先生见我之前，我必须同意预付一千美元的费用。当我犹豫地说，我不知道如何能立刻弄到这么多的钱时，他回答说，象他们这样有名望的律师事务所，这是最低的费用了。不过人们并不都总是能够照付的，例如，史沫特莱，她同意付，但是没有能够付成。如果我付不了，我是不会受到逼迫的。我考虑，既然共产党曾推荐罗杰，而他的规定也是必须接受的，所以我得付他这笔钱。我还被告知，这笔费用不只限于大陪审团，而且还包括由于我在莫斯科被捕而引起的，美国政府所要进行的其他检查都在内。

我把医生开给我的健康状况证明书交给罗杰先生看时，他说把这交给大陪审团，作为我第一次不能应传出庭的证件很有用。不过，他们大概曾等着我去，而我的缺席可能使他们很恼火。所以我很难拒绝出一下

庭，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说，他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有什么特殊原因必须召见我，“你现在很出名，地方检查官可能想使你出庭，利用你的名声来搞到什么好处。”在他的极力主张之下，我同意他可以在第二天安排我去见大陪审团，并设法借口我的健康不好，使我出庭的时间很短。他说，只要我这次出庭使他们得到满足，无疑地，他们会让我请假休息一些天的。至于我应该说些什么，罗杰先生实际上什么主意也没有给我出。如果我回忆得正确的话，他建议我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而且警告我，我将在宣誓之下回答问题，所以任何虚假都可构成伪证罪。他又告诉我说，他自己要同我一起去那开庭的地方，但是他得留在外面，因为律师是不准在大陪审团面前陪着他的当事人的。

一千块钱所得到的意见好象太少了。不过，更为重要得多的是，当我坐在罗杰先生的事务所里时，我进行了两次重要联系。第一次是通过电话同我的朋友皮尔逊医生联系，她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克伦威尔。当我一听到罗杰先生说，次日下午同大陪审团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之后，我可能有希望被放下一个时期，我就马上打电话给皮尔逊医生，并问她我可不可以在这之后立刻到她家里去休息。她热情地问候我，并要我一有可能就马上来，我愿意在她那里呆多久都可以。

第二次是在罗杰先生事务所里同一位美共领导人会见，他说他是美共中央委员会派来看我的。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向我问候，并且说：“唔，安娜，你使自己陷进很大的麻烦当中了。”我回答说，我知道，并且我好象也给党造成了某种问题。我说，我从这一经历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没有作过间谍，我也不知道我曾经做错过什么事情，但是我确实在企图到中国去的这件事情上，曾经纠缠住一些苏联官方人员。这事一定激怒了很多。我不很清楚我是怎样，并且为何会激怒了他们，但是我确实知道了苏联在我的工作计划上不是帮助我的一位老大哥，而是有他自己主张的国家政权，而且是非常粗暴地对待我的计划的国家政权。我好象在某些地方使它的目的受到了挫折。我希望美国党能够使这事得到解释。

当我那位朋友听到我的这些话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说：“你愿意到全国各地，在听众面前这样说吗？不是在党的听众面前，而是在党的帮助之下去说。”

“我能吗？”我问，“这是你给我的希望，我可以从困境中挽回一点什么来了。我很高兴这样做。”

在这点上，他使自己遇到了难题，他说：“我什么也不能答应。我只能回去报告。我不知道他们将怎样决

定。”他又补充说，他要马上离开城里去干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内他能让我知道结果。我叫他打电话到皮尔逊医生那里找我。当他离去时，我感到我的希望很大。

\* \* \*

大陪审团第一次开庭，没有发生明显的意外事故。我赶上了下一班到康涅狄格车站的火车，爱米莱<sup>①</sup>来接我，开着车子接我到克伦威尔她的家。她把我安顿到床上，检查了我的身体，告诉我她要把医生证明书送给大陪审团，证明我必须在克伦威尔最少卧床休息两个星期。她把病单念给我听，听起来是怪严重的。不过她再一次向我肯定地说：“没有疑问的是，象我在证明书里说的那样，你严重脱水，并且使你的心脏紧张到了极度。但是不要担心。象你这样大的年纪和体重，象你经受过这样多的事情，这种情况一点也不意外。我一定要使你呆在这里，直到我把你的体重减下来，同时补足你身体中的水分。只要仔细照顾好饮食，并且彻底卧床休息，这是可以办得到的。”

---

<sup>①</sup> 爱米莱：即皮尔逊医生。——译注

# 5

## 在美国东部

**在**皮尔逊医生的护理下，我恢复了过来。在这几个星期中，我继续想办法同美共联系，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已经逐渐成为我在美国从事活动所依靠的主要谘询来源以及我的大部分定期演讲会的主要赞助者，而且因为我相信他们是这样的渠道，通过它我可以最后使莫斯科相信我并没有他们所指控的罪行。这种指控的后果已经很快地毁掉了我在世界各地共产党中的声誉，特别是使得那些原已同意出版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的欧洲国家，统统都撤销了出版合同。

在那时，这是莫斯科指控最严重的后果了。虽然我把我写的关于中国的材料仅仅是部分成功地在美印了出来，不过我觉得它在欧洲六七个国家中的出版，弥补了美国之不足。可是在这许多国家中，实际上只有

法国在我被捕之前就把它出版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对所有已经接受了我写的关于中国书的国家的出版单位，统统都写了信，告诉他们这本书里的材料比我的名誉更重要，如果莫斯科对我的指控（我说它是完全错误的）使它不可能在我的名下出版的话，我允许他们可以使用我的材料，而不必说明作者的名字；甚至可以和别的作者的书合并在一起。我记得法国的出版社简直是以外交家那样的冷静来回答了我，他们在信里对莫斯科的指控连提都没有提，而只是说书已经出版了，而且已经出售了。如果我记得正确的话，他们甚至还寄给了我的代理人一些版税。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本书后来怎样了。我想它大概是不声不响地被抛弃掉了。

这时在美国左翼书店出售的我的一些书，很快就不再出售了。这些书就是《明天的中国》，这是关于我所目睹的中国情况的那本较大的书的缩写本，还有一本小册子《在北朝鲜》，这本小册子约有 50 页，美共出版社 1949 年 1 月出版，2 月我被捕以后就很快不再发行了。幸运的是，通常送给作者的六本样本，已经寄到加利福尼亚我的家里。几个月后，我去到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发现了它。所以，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开始后，我能够重印了这个材料；它是朝鲜战争前西方作家所

写的关于北朝鲜形势的唯一的报告。如果不是由于我的被捕，这个材料可能已经广为美国的进步分子所知道，而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情况，来反对美国侵略。

我有时常常这样想，莫斯科当局会不会曾经想要破坏掉我那些关于中国的报道，而且这是不是就是逮捕我的一个原因？关于这，我没有办法知道，但是这些著作的大规模遭到破坏，则是实际的结果。今天我认为，因为我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当中共早年只是采取外国的意见时，他们遭到了许多失败，而只是在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定出了政策以后，才最后成功了——很可能莫斯科当局对于我所写的东西比我懂得的更多，以至于用实际行动来阻止它的出版。这至少是他们那时行动的结果。

我很快察觉到我那要联系上美共的希望已经破灭了。曾在罗杰先生事务所见到我并且告诉我他要去向中央委员会报告的那位对我很友好的代表，没有再见我。我最后向他的城外寓所打电话，才找到了他。他告诉我他要进城同另一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去讨论这件事。他要我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他说，倘若他取得了什么成果，他自己会打电话给我的。这很清楚地表明，大多数人是反对我的。

我试图恢复老关系的努力失败了，而纽约所有的

报纸、新闻社都想方设法要同我建立起联系来。皮尔逊医生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使记者进不到寓所里来。有一次，一个赫斯特的记者确实爬到了一棵树上，向着窗户窥探我的卧室，以证明我的确就在里面，电话机也不间断地响，这大概也使得皮尔逊医生不能正常工作。我来到了克伦威尔的消息很快就在这个小城里传了开来，而这确实打扰了我的女主人，使她不得安宁。她用那默不作声的英雄主义来保护我和护理我的病，我对她永远感激不尽。

有个著作代理人很快就给我来了信，他介绍自己是一个进步党党员，他说他愿意处理我的公众联系事务。他建议我把我的被捕写成多篇连续性文章。我曾问过罗杰先生他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他说他确实是个进步党党员，并且曾为罗杰先生做过一些事情，做得还能令人满意。于是，我自己就一下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人不仅代表进步党，而且还代表共产党，在那个时候，进步党和共产党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我想：“他们不敢公开地接近我，于是就采取了这种方式来同我接近。”

于是我就连续写了六篇文章，尽可能客观地描写了被捕和被关进监狱的整个经历。我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自己来分析这一经历，同时也是为了向我的同志们

作一篇忠实的报告。我把这六篇文章送给那个著作代理人,并要他把这些文章转给愿意读它的“某些进步党负责同志”,特别是给其中某些领导同志看。我很快就接到了答复说,《纽约先驱论坛报》接受了这些文章,并准备为这六篇文章付出五千元。我用电话回答了他:“我是叫你先给进步党的负责同志看的,”他回答说:“我可以把它送给你提出的任何进步党党员看。”从他的谈话当中,很快就弄清楚了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著作代理人,主要兴趣在于挣钱;他同进步党的仅有联系不过是他曾为罗杰先生个人的竞选活动做过一些宣传工作。他不懂我反对的意思,不过他说,他愿意把原稿给亨利·华莱士看看,而华莱士不久前曾是进步党的总统候选人,对我来讲,他应该完全算得上是个权威。

我为了掌握我自己的文章而同这个代理人和《纽约先驱论坛报》进行了为时十天的斗争,这十天如果在莫斯科监狱里的五天相比,则是一场更大的恶梦。正式说起来,我这时还是“卧病在床”,不能应召到大陪审团那里去,也不能同纽约打长途电话。我的文章,本来是作为机密报告写给我的进步党和共产党的朋友们看的;如果可以发表的话,也是想在《国民前卫报》上刊登出来的,而它现在却在纽约一家为首的资产阶级报

纸的手里了。我一点也不能从我的左翼朋友们那里得到处理这个问题的主意。罗杰先生，这时我还把他当作一个进步党党员，而且由于他是某些共产党领导人的律师而信任他，他这时只不过告诉我说，避免同大陪审团发生什么麻烦的最好办法是由我自己来公布全部事实经过。他说，“地方检察官只不过是想要利用你的名声来捞点什么油水，而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则是打破他的计划的最好办法。”他还告诉我，“亨利·华莱士看过了我的那些文章，认为写得好。”

\* \* \*

当我的医生最后允许我从病床上起来应召到纽约大陪审团那里时，我记得我的健康状况仍然不好，走路都很困难。我从大中央车站沿着四十二号街走到“远东政策民主委员会”的所在地，爬上了楼梯很陡的四层楼，直到办公室。他们很意外，但不是很高兴地看到了我，可我还是一屁股坐到了一把椅子上，直等到最负责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我说，“我是到一个著作代理人的办公室那里去而路过这里的，他等着我去签一份将在《先驱论坛报》上登的六篇文章的合同。他告诉我，如果我不签字，他们也要发表，不过将作为是我写的但我却又要压下来不发表的东西而发表出来。如果我签字，或许我还能控制文章的版权。往常我依靠出主意

的那些朋友们现在谁也找不到。请建议我应该怎么办才好。”他们拒绝给我建议，但是据我回忆，他们最后还是接受了我为此而准备的文章副本，同意把它们送给某些“负责同志”。我要求有什么意见，可送到罗杰先生处交给我——那时罗杰先生建议我呆在他的寓所里，直到大陪审团开庭完毕。这既回避了记者，而又便于商量事情——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这个委员会或哪一位别的“负责同志”有什么回音。

\* \* \*

应付大陪审团并不很困难。据我所知，大陪审团的成员多数是由上层社会选拔出来的普通公民所组成。我现在回忆了起来，这个大陪审团的主席是个“图书俱乐部”的头头。图书俱乐部的主要任务是介绍书籍给它的会员去阅读。他在法庭上宣布说，他们都应很欣慰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向一个访问过许多国家，写过很多书的作家来提问题。他提的问题以及其他入提的一些问题，同我往常在演讲会上所回答的问题一样，都是些爱穷根究底而全无敌意的问题。虽然大部分讯问实际上简直可以说是愉快的，不过小心提防圈套，还是必要的。因为大陪审团是由地方检察官来指挥的，他的职业就是抓罪犯，他成功的大小是用他所处罚的罪犯数目之多少来衡量的。

地方检察官这个人，特别是他的一些助手，总是在注意找机会来诱陷我。例如，他会带着讥讽的口吻这样说，“文学谈够了，让我们回到间谍角度上来吧。”一次，他介绍纽约发生的一桩“煽动叛乱”一类的案件的判决名单，他逐个念着长名单上的名字，看我是不是认得他们。当我一个接着一个单调地拒绝认识他们时，他突然插进一个另外的名字，叫这个名字的人我曾经在罗杰先生的事务所里遇到过。我一下子感觉到他预料我将继续否认，如果我这样，他就能够判我以伪证罪。我不但承认了我认得这个人，而且我还承认我老早就认得他，当他同一群年轻的美国农民带着拖拉机来救济俄国灾荒时，我曾在苏联遇到过他。这就是设下的陷阱的一种。我还记了起来，那个助理地方检察官问了我一个马克思主义问题，我回答说，我不认为我是个马克思主义专家。对于这一点，他公开地讥讽我，好象由于我长期住在苏联，我就一定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专家。我仅仅这样作了回答：“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认为我在研究新闻事件方面可以说得上是个专家，但是我却从来就不善于搞理论。”

\* \* \*

就是这次去纽约，我也同时第一次去会见了那个著作代理人。我已了解到他同进步运动的关系只不过

是很普通的关系，他主要是为罗杰先生的竞选活动搞一些宣传工作。对于在《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我的文章会使我感到犹豫，他一点也不同情。我记得他总是说我那些文章将会得到五千块钱，说的次数之多使我很厌烦。于是我就给他写了个书面通知，说明这些文章可能收到的钱都不应交给我本人，而必须作为一笔特殊基金交给罗杰先生，首先应该付清我回到美国来的费用以及罗杰先生自己的一千元的费用，这之后的剩余应该送给将由我指定的各种宗旨善良的事业。

“从此以后”，我说，“我要求你停止谈论这五千元钱。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谈论你自己的百分之十的五百元佣金。但是要闭口不谈给我什么钱的问题，并把注意力放在这样的政治问题上：在《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这些文章是不是一件好事。”

这以后，他就开始比较严肃地讨论问题。他承认如果我反对，没有我的签名《先驱论坛报》就“不能合法地”发表这些文章。但是他们能够从中取出全部事实，甚至引用很多我所用的字句，并把这些当作我曾拿出来而又撤了回去的东西来发表。他说，如果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我就一点保护也没有了。不过，如果我允许用我的签字来“合作”，我应有权变动我的文章。

在接着的一些日子里，我和《先驱论坛报》之间的

斗争继续着。我要作一些变动。他们要作另一些变动。他们反对我的变动，我反对他们的变动。代理人和我的律师罗杰先生，不是支持《先驱论坛报》，就是觉得我太小题大作了。我赢得了一些分数，但是整个看来，我是输了。《先驱论坛报》在最后的时刻，欺骗地印出了我在校样上曾经删去的东西。这时我极度地精疲力尽，拿不准我的判断。我多年来依靠同朋友们商量来形成我的判断，但是这种商量这时已被剥夺殆尽了。只有很少的进步朋友我还能联系上，例如皮尔逊医生，他们觉得这些文章是值得发表的。最后我也同意了。

这六篇文章发表的结果有好有坏。美共本来是一直避着我的，这时找到了理由公开指责我。他们不敢指控我在莫斯科是个间谍，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他们这时攻击我“给资产阶级报纸写文章”，甚至可以宣称我的文章是“攻击苏联”的坏文章。事实上，我的文章并没有攻击苏联。

至于我身体上所受到的实际伤害还不很严重。对于我，伤害是在精神上。这是由于我多年来对苏联的信仰以及由于我多年来的社会联系缩小到极左派当中，而现在，这些联系都断了。我不知道逮捕我的准确原因，我从来不曾知道过。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来自某些地方官员，他们被我坚持要求到中国去这件事所惹

恼，或者来自更高的当权者，他们为了要粉碎我高度估价中国胜利所产生的影响而逮捕了我。我觉得我有理由否认对我的指控，但是很少有理由去怨恨它。如果他们认为中共和中国必须先得到他们的认可才能获得世界声誉，而不能通过一个美国记者这样来获得，则我的坚持的确使得苏联新闻司很厌烦，而我发表了中国走向胜利的自力更生的道路和“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也的确可能惊动了俄国人。

皮尔逊医生告诉我说，她参加了进步党的一次会议，在会议中讨论了我在《论坛报》上登的文章，这时我觉得心里宽舒了好多。出席的共产党员指摘这些文章，但是非共产党的进步党党员则称赞它们。我心里感到宽舒的是，由于这些文章发表，起了我要它起的作用。这些文章指出苏联不是一个邪恶的国家，但是可能犯错误。这使所有普通进步党党员都安下心来，但却既激怒了右派，也激怒了共产党左派；既激怒了那些宣称苏联是极端邪恶的人们，同时也激怒了那些宣称苏联是极端善良的人们。

没有想到的是，《论坛报》上登了我的文章以后，“德波戴出版公司”表示愿意出版我那本关于中国的书。这个公司的头头，肯·麦克考米克，到纽约的旅馆里来访问我，表示他对于我论述被捕经过的态度客观，

印象极深。他要知道我是不是有计划要出版一本书。我回答说，关于我所目睹的中国情况，我已经写好了一本书，但其中的一部分业已用小册子的形式在美国出版了，书名是《明天的中国》。他回答说，这没关系，他要看一看原稿。他看了以后说，如果我将书里的材料重新组织一下，并一直写到最近的情况，他愿意接受它。我起初犹豫了一下，怕他要求作某些政治方面的改变。事实上，“德波戴”从来没有要求政治方面的改变。他们要求把书全部重写成一种能够回答他们所考虑的基本问题的体裁，这些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怎样起来掌权的？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经济政策？他们的军事战略？于是我就把材料重新组织了一下，集中回答这些问题。书就出版了。

我非常高兴的是，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会得到这样满意的结果。在我看来，我在莫斯科被捕这一完全不幸的事件，甚至于已经被这一事实变成了一个好的结局：我最后还是成功地把中共要求我向全世界，特别是向美国公布的材料发表出来了。不过，从书的销数看，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它没有象“德波戴”预期的那样好销路。根据他们的计算，他们须卖掉近六千本才能补偿他们花费了的基本成本。他们没有完全

办到这一点。他们把我的名声也算进了提升销数的因素；同时也将以前卖过我的书的全部左翼书店的正常销数都计算在内，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己的销售额。而且这本书出版时，正当中共在巩固他们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相信它一定会很畅销。我特别希望美共会发现，这本书正好给了他们所需要知道的有关中国的一切，并且开始再接受我。

相反的事情发生了。这本书确实包含着美共最需要的有关中国的东西，但是美国没有一家左翼书店愿卖这本书，因为它写着我的名字。剥夺了共产党控制的书店的销路，“德波戴”仅仅收回了生产成本。为了促进发行，我从他们那里买来版型，获得版权，并把版型给了坎萨斯州的一家专卖廉价书的知名书商，“郝德曼—朱利厄斯”，他们发行了一种平装本，获得了一些成就。

在1949年的暮春时节，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访问了美国的几个地区。莱蒙·罗宾斯上校邀请我到佛罗里达他那里去访问。我在那个愉快的环境里，度过了几个星期来写书。我在纽约还参加了进步组织的许多集会，寻求我能够想得出来的方式，来同美共接触，并向他们证明我还是一个进步分子，象支持中共那样我也支持苏联。每一个企图都失败了。越来越明显的是：

我能够参加进步组织的集会，凡是那些不是共产党的人都欢迎我，但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拒绝同我讲话。我在一些演讲里仍然以友好的态度论及苏联，美共的一般党员开头还对这个事实表示欢迎，可是后来，他们组织里的上层当权者把他们统统搞到一起来反对我了。

共产党第一次对我公开攻击是发生在当我试图给美共领袖的辩护工作赠送一笔钱的时候。《先驱论坛报》的五千块钱已经按我的指示存入罗杰先生事务所的信托基金帐户里，从这笔钱里面，他已经支出他自己的一千元费用和代理人的五百元的佣金。我指示他送一千元给“福来方场辩护案”<sup>①</sup>（他就是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之一）；我还补充说，他送钱时要附一题词，写上“一个在冷战中牺牲的伙伴赠送”。几天之后，共产党的最高当局指责我“企图贿赂他们”，把钱退了回来。拒绝我的赠款的新闻在世界各地发布了。那时在南京

---

① “福来方场辩护案”（Foley Square Defense）：1948年7月20日，美国共产党中央十二名领导人，包括美共主席福斯特，总书记丹尼斯等，被控鼓吹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而被捕入狱。后来福斯特由于年老心脏患病，从十二名当中被提出单独审判。其他十一名作为一个案子在福来方场联邦法院审判。这一案件自1949年1月17日开始，一直审问到同年10月14日，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罪案”审判。10月21日宣判，十一人每人被处罚款一万元；其中十人监禁五年，一人三年。——译注

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我的一个侄子听到了，给我来信说，如果我有被拒绝的多余的钱，他可以在青年会里使用。后来我到了罗杰先生的事务所，他把送去而被拒绝的支票退给我，我震惊地看到他把“一个在冷战中牺牲的伙伴赠送”这一行字打在支票后面通常签字的地方。这样，美共就得在这行字的下面签字了。我立即责怪罗杰先生说：“是你使他们拒绝这笔赠款的。他们不能被要求去签这样一张支票，来承认我是在冷战中被牺牲的他们的一个同伙。”罗杰先生道歉说，这是事务所的一个秘书的粗心，他把我说的“题词”误解为在支票上写一题词。我非常生气，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一直不知道这究竟是无意做错了，还是有意挑拨。

威廉姆·潘特生是“公民权利大会”的书记，共产党通过它来处理这方面的法律事务。罗杰先生告诉我，当潘特生退回支票时，好象心里很难过。如果我不要求任何重要的共产党员签字，他或许是愿意接受这种赠款的。我建议可把这笔钱赠给潘特生，为“特伦敦六人案”<sup>①</sup>使用，这是一桩黑人被控犯罪，但是“公民权

<sup>①</sup> “特伦敦六人案”(The Trenton Six):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成了一些残暴陷害案件的受害者。“特伦敦六人”就是这许多陷害案件之一。当时特伦敦有六个黑人被诬告杀死了一个白人，在全国范围的群众斗争之下，六个人中有四人最后获释，其他二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译注

利大会”为他们辩护，认为他们是被诬陷。我就把赠款给“公民权利大会”，钱马上就被接受了。我了解到，如果他们可以不签字承认收到，共产党还是愿意接受赠款的。我也了解到罗杰先生就是“特伦敦六人案”的律师，他用这个方式来保证他将来的部分收入。

从此以后，我形成了一种习惯，每当参加一些进步运动的集会或宴会时，如果当场募集捐款，我就捐赠较大的款额。在这样的大多数情况下，凡赠款超过二十元，有时只要超过十元，主席就会宣布赠送者的姓名。有几次在这样的集会上，我赠送了一百元，同时注意主席宣读赠款名单。这时，当他念到我的赠款时，突然为难起来，接着宣称：“一百元……一位友人赠送。”这仅仅是连续不断出现的美共抵制我的少数事例。

我决定回到加利福尼亚去，那里还有一所房子，是我的家。在走之前，我最后一次尝试接近美共的上层。这时我住在罗杰先生的寓所。他问我特别想要会见谁。我说，如果他，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辩护律师，能为我安排同其中任何一位谈一次话，我将很感谢。他建议由罗杰夫人邀请威廉姆·潘特生和他的夫人吃饭，“潘特生曾经接受了你的赠款……”我插进来说，我在莫斯科曾会见过潘特生，这时很愿意再见见他。罗杰夫人发出了邀请，还说明斯特朗女士将在座。潘特

生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也很高兴，因为障碍似乎打开了缺口。可是，当我进到吃饭的屋子里时，我从潘特生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见了我很吃惊。我后来听说，那天上午他是在一个很嘈杂的房间里接到邀请他的电话的，他将在罗杰先生家里参加一次社交活动使他非常高兴，高兴得使他没有注意听其他客人的名字。

接着的晚餐是我记忆中的最奇怪的一次晚餐了。围着一张小桌子只坐着我们六个人：罗杰夫妇和他们的从大学回来的儿子，以及潘特生夫妇和我。在这样的小圈子里，罗杰和潘特生在“个人思想”与“集体思想”的比较这个问题上争论了起来。罗杰先生说，“个人思想”是最自由的，是最好的；潘特生则为“集体思想”辩护，说它多半可能最正确。我支持潘特生，反对罗杰。我的论点打动了罗杰。但是潘特生看来好象始终没有我这个人在场似的。他一句话也不对我说，他一眼也不看我，好象我根本不在场，而我和他不过只有三尺远。饭后，我们进到一间大一些的休息室里，别的客人也都进来了。我看到潘特生就要离去了。我同罗杰说，“如果你能办得到，给我十分钟单独同那个人谈一谈。”他点了点头。他退到前厅里，把潘特生叫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回到休息室里来叫我。他说，“在前门对

面那间小屋子里你会看到他。”

潘特生僵直地站在那里，同他说话很困难。我说，“我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同一位共产党的负责人说话。我要求你告诉他们，我没有从事过莫斯科所说的间谍罪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指控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究竟是为什么。在监狱里审问我的那个人好象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而且不肯承认我是一个作家。我曾经希望美共，他们知道我为什么去莫斯科的，也许可以帮助我把事情弄清楚。特别要告诉他们，自从我回到纽约以后，我受到了很多压力，我费尽心思来应付，也许犯了很多错误。现在我还是处在很多压力之下，要我演讲，要我在其他社会活动中出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告诉他们，即使处境多么坏，没有什么处境不能被好的建议所改善，或者被坏的建议搞得更糟；我除了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建议外，我不愿再从什么别的地方得到建议了。”

潘特生一直听我说完，没有任何表示。然后他回答：“我一定告诉他们。”接着又补说：“今晚”。

我说：“已经十一点钟了。没有必要在今晚。”

他说：“不，有必要。”

我说：“你的意思是，由于是被迫同我接触，你就必须在睡觉之前报告这件事情？”

他僵硬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一个字。

这是我在美国东部试图同美共上层联系的最后一次。

# 6

## 回到西海岸

**在**返回西海岸我的家时，我已下定决心来恢复我同太平洋沿岸工人阶级的基层联系，我觉得这样做是时候了。我要这样做理由很多。我的早期革命活动开始于西雅图劳工运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雅图总罢工。三十多年过去了，大部分时间是在苏联度过的，同时也消磨在访问别的国家的革命和回美国演讲的往返旅行当中。我自问，同本乡本土的革命运动的直接联系脱离太久了。我确定，我同西海岸运动的活跃联系必须恢复起来，那里的人们还是记得我同他们过去共处的岁月。我还想，这么长期间的离去，可能已经使我在性格上或者在态度上有些变质了，这甚至可能导致我在莫斯科的被捕。

很好吃，我对自己说，我要证明下自帕洛阿尔托的

基层小组，上至斯大林，民主集中制都是有效地在起着作用。帕洛阿尔托的进步党派我当代表去参加进步党的全国大会，在那次大会上提名亨利·华莱士为总统候选人，这只不过是一年多前的事。我要首先使自己立足于这个进步党的小小的地方组织，从事任何对帕洛阿尔托社会有益的普通日常工作，并且在进步党中不断扩大的活动圈子里，逐渐重建我是一个诚实的进步分子的好声誉；然后再扩大到同进步党联系着的共产党，并且最后取得必要的帮助，来推翻莫斯科说我是个间谍的控告。同时地方工作也是很有益处的。

起初，我的计划象是进行得很顺利。我在旧金山短暂地停了一下，去参加劳工学院举办的一次集会。参加这样大的集会而用不着自己讲话，在相当长的期间这还是头一回，我从这当中也找到了一些轻松和乐趣。集会之后，许多听众过来欢迎我，并表示希望我长期留在加利福尼亚。我认出他们是旧金山的工人，我以前曾经遇到过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大概还是共产党的普通党员。主持会议的委员会没有同我讲话，而且，我的出席好象使他们有些困窘。这并没有使我不安。对那些来到我跟前，问我要在加利福尼亚呆多久的人，我微笑着回答说，这要看他们了，要看加利福尼亚的朋友们要我呆多久。他们肯定地向我说，这一定会是一段

很长的时间。

回到帕洛阿尔托，那里我有一所房子，我就在那里安置了一个家。在累积成堆的邮件中，我发现了我写的关于北朝鲜的小册子。我很高兴，当纽约共产党的出版社撤销这本书时，至少有这六本被保存下来了。我去同当地进步党的书记联系，他本人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全县范围的野餐。我去了，对我的招待很不坏。许多参加野餐的共产党员同我讲话，但是我没有必要去打扰他们。因为还有许多好的进步党党员，我能同他们进行友好的谈话。我断定我的计划是正确的，我能够同普通进步党党员建立起友好关系，并且能够逐渐扩大这种关系。

当我往南到了“洛杉矶第一唯一神教会”（也就是斯蒂芬·弗里奇曼牧师的教会）去演讲时，我发现这个教会的“社会正义团契”的确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抗议我的被捕。我并没有让他们那样做，他们那样做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美国的进步运动。他们给了我这封信的副本。这封信提出了一个强烈而庄严的请求。它是以这样的陈述开始的：“社会正义团契”一直支持苏联，在早期为承认新的苏维埃政府而工作，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支持苏联的政策。这赋予他们以权利和义务来反对苏联造成的错误。他们说：

由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指控是个间谍而被捕并被驱逐出境，“使美国进步分子极度沮丧”，甚至影响他们对苏联本身的看法。美国进步分子的大多数不相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个间谍。他们看着她工作了那么多年。如果苏联真有什么反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事实，他们要求把这些事实公布出来，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个机会来答辩。如果苏联没有这样的事实，他们就应该公开宣称关于间谍活动的指控，是个错误。

这封信，由苏联大使馆转送斯大林。这是我所知道的为抗议我被捕所采取行动的唯一的组织。这坚定了我的决心，要在太平洋沿岸的进步势力中，发展我的联系。

几天之后，我回到帕洛阿尔托，我听说在当地的进步党组织中关于我的争论已经开始了。那些不是共产党的进步党人士，对于我的回来表示高兴，建议利用我的名声举行集会，在会上请我来讲中国。这个主意被所有的共产党员所坚决反对，有人甚至要求把我开除出进步党。不过，进步党的县委书记，她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说没有人有权力把我从进步党开除出去，因为我不是通过那一个地方组织参加了进步党的，而是在上一次选举中，我在投票记录上把我的名字写作一个

进步党员而进入了进步党的。根据法定手续不能开除我。我的对手们就想方设法来指责我。最后，帕洛阿尔托组织开会，以这样的折衷决议来保持统一：进步党本身不得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举行任何集会，但是个别的进步党党员如愿意召集这样的集会，则不予反对。

在帕洛阿尔托，立刻就有一些进步党的主要党员要求我出来主持关于中国的讨论会。我从南边回来时就面临着这个请求。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请求。我沮丧地听说，我的来到已经在帕洛阿尔托组织里引起了意见分歧。但是我相信，经过举办中国讨论会这样平凡而有益的工作，我会使帕洛阿尔托的进步党人觉得我还是有用处的。这个讨论会是在一个私人家里召开，大约只有二十来个人参加。我为每周集会所花费的准备时间，要比我过去为大得多的演讲会所花费的准备时间还要多。举行了四次这样的集会，每一次参加的人都比上一次增加。第四次集会时，进步党的县委书记开车来参加，会后跟着我的车子到了我的家，来同我谈话。她没有进我的家，这并没有使我惊异，因为我知道她是个共产党秘密党员，党的纪律不允许她走得那么远。可是她告诉我：“在这次讨论会中你干得很好。W教授曾经报告说，他抱着很大的怀疑来参加这个讨

论会,以为你要宣讲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好”。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W教授大概是大学里的一个秘密共产党员,他在讨论会上提的问题,表明他是一个明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觉得我是在稳步地走向被接纳的胜利的道路上。

下一个星期,在她家里举行讨论会的那个妇女,上午打电话告诉我:那天晚上的会议不能举行了。她好象有点为难地说,“也许我们在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可以举行。”她告诉我有七个参加者来电话说他们另有约会,而她不愿意叫我为缩小了那么多的讨论会“浪费我的时间”。

我回答说,即使讨论会缩小很多,我也愿意花费时间,但是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我不能来,因为我要到洛杉矶去,我必须到那里去演讲。

她仍然很为难地建议下次会议也许可以在我从洛杉矶回来以后举行。我回答:“我想我不回来了”。她吃了一惊,问我为什么不回来。我反问她那七个有“别的约会”的人的名字,她说了他们中的一两个,然后停住了。

我说,“很清楚,从你说的名字看来,讨论会就此结束了。很清楚,我呆在帕洛阿尔托,将使这里的进步党分裂。我早就想,也许最好是搬到洛杉矶去,讨论会的

这次事件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我这次去洛杉矶，要为我将来的家作些安排。”

她伤心地回答：“我想你是对的。”

我后来听到了帕洛阿尔托发生的事情的详细情节。共产党的州委派来一位代表，告诉帕洛阿尔托的共产党员说，“一窝铁托分子突然出现在这里，必须扑灭它。”指的就是我的中国讨论会。帕洛阿尔托的主要马克思主义者，W教授，前一个星期还说了那样称赞的话。可是，当地的判断不能影响州委的决定，我的讨论会必须停止。那些“另有约会”的人们，就是背离他们自己的判断而接受州委命令的人们。我如果再停留在帕洛阿尔托，明显地会分裂这个地方的进步党的弱小组织，甚至还会分裂整个县的进步党。

几天后，当我在洛杉矶演讲完了以后，我要求同弗里奇曼谈一次话，我告诉他我的处境，并且说：“帕洛阿尔托和圣克拉拉县的进步运动太弱小了，吃不消那种不论我到那里去，美共都要发动反对我的那种争论的。我想搬到洛杉矶来，已经这样想了一些时候了。洛杉矶是个很大的地方，能吸收并使用各种各样的人。我对一个人孤立地工作没有信心，我要参加进某些进步运动的组织里去。如果我申请参加你的教会，我会有用还是会造成磨擦？”

弗里奇曼先生同我谈了一个小时，问了很多关于我在苏联被捕的问题，以及我对苏联的态度和对美共的态度，然后他回答：“我们将很高兴吸收你为教会会员。我认为你在这里很有用处。在我们教会里你会遇到一些人，他们是教会会员或者是在这里的服务人员，而同时你也会认出他们又是共产党员。在教会里他们会对你很客气，虽然在外面他们也许不同你讲话。”

这些话显示出“洛杉矶第一唯一神教会”的性质，以及为什么我要参加它的原因。虽然它叫“教会”，无疑的，它是加利福尼亚南部最强大的进步力量，比当地美共支部还要强大。这个教会中有一个组织是世界上唯一直接上书斯大林，表白我无辜的一个组织，这个事实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我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来搬家。我卖掉了我在帕洛阿尔托的那所房子，把大部分家具都处理掉了。我在洛杉矶郊外拉克利森塔买了一所小房子，成了休·哈代曼的邻居，他也是唯一神教会和其他许多进步运动的成员。他待我很好，并反对莫斯科诬陷我的人们中的一个。除了哈代曼一家之外，我的新居是一所孤立的房子，面对着一条山景宜人的崎岖峡谷。不过，哈代曼寓所是许多进步集会的中心，同他们在一起，我还可以参加洛杉矶和帕西登纳进步分子的其他集会。对

于休·哈代曼和他的夫人苏姗帮助我再一次恢复社会生活,我永远怀着感激不尽的心情回忆他们。

同时,新的活动路子开始出现。在1950年初夏,当我最后定居在拉克利森塔不久,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个“宗教自由主义者”(唯一神教徒和宇宙神教徒)的夏令营,在离洛杉矶不远的圣贝纳迪诺山里宣告成立。因为我总是喜欢在山上扎营,并且还想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进步分子中间开展交际活动,我就到夏令营去了。于是我就到山里去散步,并在朝鲜战争开始后,参加了露天集会。我们是从收音机里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弗里奇曼先生,他是夏令营的发起人之一,要我在最后某次“火边漫谈”中作一次关于朝鲜的演讲。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访问过北朝鲜的唯一的美国作家。我高兴地照办了。有趣的是,后来我听说,听过我讲话的人回到家里去报告,他们的邻居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并且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很明显是斯大林派到美国来组织反对朝鲜战争的,所以莫斯科对我的控告“只不过是一种计策”。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愚蠢的谣言了,但是在冷战的气氛中,愚蠢的谣言总是流行的。

不过,我在山里作的关于北朝鲜的演讲,是我自己的生活的一个转折点。我一回到城里,唯一神教会就

要求我作同样题目的演讲。青年组织首先提出了这个要求。当我一答应，教会的几个别的组织也都要求参加。可是理事会里也有人起来反对，因为美国已经深陷入了战争，有些人怕我的话会被看作是叛国。后来集会还是在1950年7月16日在教会的大厅里举行了。斯蒂芬·弗里奇曼牧师亲自在他的暑假里回来当会议的主席，以便稳定理事们的心。

我以前准备演讲从来没有象那次一样。过去我一般只靠少数几页笔记，从来不事先写好演讲词的。这次我知道，任何对朝鲜战争的反对，都可能被当局认为是叛国。我甚至可能直接从讲台上被抓到监狱里。我决定把我的整个演讲词都写下来，并严格按照写的讲。如果被捕，对于我讲了一些什么，可以有准确的证据。我的演讲攻击美国出兵朝鲜，是建立在确切的事实之上的。我很高兴的是，我的小册子《在北朝鲜》有六本被保存了下来，它就作了我的材料来源，因为所有我的原始记录已在莫斯科被没收掉了。

在最后的两三天里，我决定把演讲词油印出来分发给听众。教会有一架油印机，但是不借给我，因为理事会对我的演讲有争论，同时也因为他们说，他们的油印机太旧了，必须非常小心使用才行。我为此买了一架便宜的油印机，在尽义务的年轻人帮助下，印

出了九百份十二页的文件。我原来计划要印一千多份的，但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印坏了很多，结果只印出了九百份。最后我定了价格，十分钱一份，一块钱二十份。

这次在教会里开的演讲会，同那里开过的任何一次大的集会都一样大，不但礼堂的主厅坐满了人，旁边一些装有扩音器的屋子也都满座了。起初，气氛很紧张，因为听众在等待着有什么言词会被认为是叛国，而且他们也拿不准究竟应该如何反应才好。我按照1947年在北朝鲜的三个星期中所见到的情况来讲朝鲜战争的背景，听众越听越被我讲得相信美国军队没有必要在朝鲜作战。演讲之后，许多人要把我的演讲稿送给朋友；因为我已经在它们上面标明了一元二十份，许多人就扔下一元钞票，拿走二十份讲稿。那天晚上卖掉了一千多份，这比我们印的多，于是就记下了姓名，然后增印补发。增加的份数是用照相胶印方法来重印的，结果发出了五千多份。

一星期之后，我接到从美国各地的来信，他们从朋友那里收到一份我的演讲词，而他们还需要更多的份数。自我被捕从莫斯科回来以后，除了我的护照以外，别的文件我什么也没有。即使是我的防疫证书也没有带来，我的通讯录也丢掉了。函索朝鲜演讲词的来信

很快就给我搞出来一份新的邮寄名单，它涉及美国的各州，加拿大的各省，甚至还有几个其他国外的地方。我在唯一神教会所作的演讲，是暴露朝鲜战争背景事实的第一次公共集会。美共反对这个战争，可是他们缺乏用来反对它的事实，因为他们把我发表的那本小册子给毁掉了。如果那本小册子被允许流传，虽然不会制止美帝的行动，但是却能够给美国进步分子以知识的武装。需要这种知识的成千成百的人，现在给我写信了。

在1950年剩下的日子里，我继续写着关于朝鲜的文章，我重印了我的那本小册子《在北朝鲜》，并补充进最新的情况，把书名改作《北朝鲜情况实录》。到了夏末，某个学院的一位教授来了一封信，开来一张问题清单。他问：“我对学生们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这对我好象是个好机会，不仅来回答那个学院的学生，而且还回答已经在我那邮寄名单上的好几百人。我就仔细准备好我的回信，并把它们油印出来，寄给所有给我写过信的人们。我想这样可以使我少写许多很长的个人信件。结果是人们来信索要这些“问题解答”的副本，并且开始给我寄钱付费。在11月里，我写了第二封油印信；在12月写了第三封。由于人们继续不断来信要求我发表对于朝鲜和其他有关情况的意见，并且由于人

们继续主动给我寄钱索要这些油印材料，我就从 1951 年 1 月开始出版一种油印的月刊，刊名《今天》。

一位有绘画才能的朋友，为《今天》设计了一幅画有升起的太阳的刊名报头。我在上面说明了我的宗旨：“《今天》是关于我观察时事的通讯。如果你需要，请把你的姓名和地址寄来。如果你要付费，就寄来一元。如果你要提供帮助，就多寄一些。《今天》不论付费或不付，函索即寄。”

我决定不同许多经常需要金钱资助的进步出版物争要捐款。除了预定户愿意寄钱帮助以外，我要用我自己的钱来出版。事实上，我们的钱总够用。我们的开支很低，因为我自己工作不要钱，而那位答复信件，整理材料的秘书只要比她到我家来的汽车费略多一点点的钱。干邮寄工作的是一群义务劳动者，他们到我家来工作，我总是供给一顿简便午餐。所以，我们的主要开支是纸张以及现在是由专业人员来干的油印工作，还有，我们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刊物而打了折扣的邮费。大多数读者为了弥补成本，都寄来一块钱，还有相当一些人，寄来的钱更多。

在我发行《今天》的这个期间，我的交际和活动的方面开展得很宽，但是同美国共产党总是没有接触。我后来听说，他们仔细阅读《今天》的每一期，企图从中

找出我的罪行迹象，或者最少是我对苏联的敌意。但是，他们找不出来。逐渐地我在洛杉矶的交往活动发展到了那样的程度，我得放弃我在拉克利森塔的寓所，而在城里买了一所房子。同时我外出旅行多次，其中最重要的是去危地马拉旅行，我是在阿本斯当总统的时期去的。所有这些旅行，我都用来作为《今天》的写作材料……

# 7

## 美共对我的抵制和打击

从莫斯科被驱逐回来以后，我很快就知道了，我在任何进步人士中的出现，都是一种“酸性试验”，可以验出在场的人们中间哪些人是共产党员，哪些人不是共产党员。普通进步人士总是友好地向我致意，并且对我很满意，因为我虽然在莫斯科被捕，可我没有说过任何反苏的话。共产党员则避开我，特别是党的干部。确实如此，一般党员常常倾向于相信我的善意，但是一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就马上被上面直接来的命令所制止。象我在帕洛阿尔托举办中国问题讨论会所发生的类似情况，在别的地方继续一再发生。即使是到危地马拉旅行，我找总统阿本斯和他的政府高级官员谈话，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但是那里的一家共产党小报却指责我，并公布我在莫斯科被当作间谍而被捕

的事实。这使我得到了额外的证据，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证明阿本斯政府完全不象人们在美国听说的那样，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的。

我对莫斯科逮捕我这一行动的态度，从我在监狱里度过的那头几天以来，一直变化不大。我一直不知道被捕的原因，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上层发下来了命令才被捕的，还是由于被我打扰的下级官员的错误所造成的。当我去刘宁一房间送信的时候，从门外望进去，见到的那位俄国官员很明显地带着生气的神色看着我，他可能怀疑我是用不正当的方法打听到了刘宁一的到来。外交部新闻司对于我那样纠缠着要他们给我办进入满洲的出境签证，以及我对他们把中共控制的满洲铁路说成是“铁路上有土匪”所说的挖苦话，是有足够的理由恼火的。当中国妇女代表团从布达佩斯会议返回哈尔滨秘密经过莫斯科时，我突然闯进了民族饭店的餐厅去向她们祝贺，也可能被什么苏联官员看到了，引起了怀疑。总之，我可以举出我的不少行动，虽然完全没有恶意，却会使下级官员恼火或引起什么疑问的。有时我觉得这中间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足以使我被捕。我以为，不论对谁，这都是很有用的自我分析，不妨停下来考虑考虑，在上两个星期中自己做了多少事，可能使过分热心的警察找到逮捕的理由。下面

这个事实加强了我的这个观点：在狱中审问我的那个人，我只知道他是“政委”，他很显然认为他是抓到了一个严重的罪犯。我在苏联近三十年的所有旅行，在他看来都是用意不善的。

我也感觉到，如果我确曾引起了什么怀疑，苏联当局给我的待遇并不怎样恶劣。我仅仅不过是在条件符合人道情理的监狱里被扣留了五天而已；我吃着颇为不坏的伙食，还被允许在屋顶平台上活动身体，然后就是驱逐出境到波兰。在今天的世界上，人们被捕并被驱逐出边境线，是很平常的事情，特别是新闻记者，在今天的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冷战和热战，他们搜集新闻材料，很容易受到怀疑。除我之外，还有几个新闻记者曾经被苏联驱逐，他们都被控有间谍活动，有时是由于在限制照相的地方拍了一张照片而引起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对他们的职业并无损害。他们回到新闻社，再被委任到别的国家去工作。在一般公众看来，“间谍”这个字眼含义很不好，可是对新闻机构来说，却很稀松平常，它可以加在只要是报道某个政府想要隐瞒的什么事情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上。所以，对于资本主义新闻界的一般记者说来，“间谍”罪只不过成了日常谈话中随便说说的话题而已。

可是，对我的后果却严重得多。由于我在生活中

用写作和到美国演讲的方式来宣传苏联将近三十年之久。在这些年代里，我在美国的大多数朋友都已逐渐变成需要并且提倡亲苏演讲的人了。这些人即使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员，也是属于通常所谓的“共产主义阵线”的。所以，莫斯科的指控几乎破坏了我同所有朋友的关系，他们大多数甚至不同我再讲话了。

我也考虑到，我在莫斯科的被捕，可能是在上面的当权者所指使的。我问自己，会不会有什么原因，甚至使斯大林也愿意我信誉扫地。这样因素，不难找到。苏联政府那时还没有承认中国新政府，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在北京成立。我的被捕是在1949年2月14日发生的，那时中共已经打下了北京和天津，但是还没有建立起他们的全国政府，而全国政府是在1949年10月1日才建立了起来的。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实际上随着蒋介石一同退到了广州，承认它的统治比别国的政府为时更长更彻底。

同时，象我这样的一个美国作家，却已经写了那么多关于新中国的文章和一本书，不仅在莫斯科散布它，而且还相当成功地传遍了东欧。如果斯大林，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这时想要中共等待着莫斯科来承认，而不要由一个美国非官方的新闻记者来为新中国预作宣传，难道会令人奇怪吗？我还考虑到，

这时我在东欧各国大力传播“毛泽东思想”以及他的成功事迹，而这个地区这时正为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斗争所撕裂。我自己虽然从来不是铁托分子，也从来没有说过中国人有“铁托的想法”，但我可的确强调过下述事实：中国革命照抄外国想法和外国模式时，总是不断失败，而只当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的领导，革命才得以开始成功。的确，这么说在东欧可能已经使人感到象是在宣扬一种独立性了，而这看起来可能同他们所谓的铁托主义同样危险。

这些考虑，使我感到不管我怎样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间谍，而苏联政府，甚至高级领导层，也会找到足够的理由要来制止出版所有我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最少在那个时期是要制止的。特别是要制止即将在布拉格，华沙，柏林，贝尔格莱德等半打以上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首都，以及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出版社出版我那本关于新中国的书。因为我已经安排好，要在所有这些首都出版我的那本书了。事实证明，我被捕的主要结果就是制止了它在每个国家的出版，只有法国除外，因为它在那里已经印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苏联控告我是“间谍”是不公正的，而我同时却不想责怪苏联政府。如果是由于下层人员的怀疑和恼怒而这样干的，我觉得我自己在冷战形势下

的行动是可以引起这种怀疑和恼怒的；如果是在最上层人物的指示下干的，从东欧的强权政治和苏中关系来看，我觉得不论什么政府是都会有理由要毁掉我的名誉和我的书。

我对美国共产党的看法要严厉一些。我认为自从西雅图劳工运动和它那次总罢工的年代以来，在美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共产党之前，他们就熟悉我的工作，这已经四十多年了。我在苏联居住了将近三十年，但是我的实际写作工作并不表现在苏联，而是表现在我为在美国出版而写作，为美国而写苏联革命和其他各国的革命。所以，我认为美共是比莫斯科更能够判断我一生的活动的。他们知道我是在去中国的路上到莫斯科的，而且还是他们促使我去的。所以，我认为他们可以对我在莫斯科陷入困境给以严厉的批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应该看到需要进行一些调查，来弄清我的问题，使我可以再从事一些有益的工作。

起初可能会这样的。当我刚回到纽约时，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罗杰先生事务所来看我，说到我给自己造成了“麻烦”时，我回答说，我懂得了不少事情。“我懂得了苏联不是在我们的许多计划中帮助我们的老大哥，而是一个国家，是一个粗暴对待我们工作计划的国家政权。”我还补充说，这样的国家政权，仔细注意它自

己的事情是必要的，这是一件好事。我的这些话引起了党派来的那位同志的重视，他要知道我愿意不愿意在国内各地可能安排的集会上出面来说一说这些话。我回答说，他给了我希望。后来的两个星期中，这个意见好象确实被考虑了，但是考虑我的问题的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同意这样办。美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的意见是不经调查就接受莫斯科的指控，并且拒绝再见我。他们就象“电讯社”在波兰的代表警告我的“那样的奴性十足，没有指望。”

假如党的领袖们同意和我讨论一次那时的处境，即使他们不赞成让我来一次巡回演讲，也是可能找到某些对待那时恶劣境遇的好办法。那时我所要求的不过是寻求一些可以让我在进步运动中工作，而又不致引起冲突的方法。但是，由于党的领袖们连一次会议都拒绝开，更不愿意对我的案子进行半点审查，他们很快就使自己走得更远，试图捏造事实来证明莫斯科的指控正确。所以会这样，不仅是因为一般进步人士，而且很多共产党的一般党员，都不相信我是个间谍。

使我认识清楚这点的，是我回到美国将近一年时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我在东部巡回演讲，当时我的演讲代理人还能够安排足够多的演讲会，来偿付所需要的旅费。那时我在纽约，是在《美亚》杂志的办公室

里。我以前曾为它写过几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在纽约我还利用它那很不坏的图书馆，研究我为德波戴公司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我突然觉得我到东部已经快一年了，我荒唐地以为，有什么妨碍我直接走到共产党总部去谈一次话。我一定是让他们含有敌意的行动在我心里造成了某种心理障碍了，其实不过是拿起电话来告诉他们，我将去看他们。我刚回来时使他们发生的震动一定已经过去了。于是，我就拿起了电话，拨了《工人日报》的号码，接着问：“这是《工人日报》社吗？”

《美亚》杂志社的秘书马上倾过身子碰断了我的电话。她说：“不要以为我想干涉你。在你打电话之前，你必须先看看今天的《工人日报》，否则你是要走进他们圈套中去的。”

我拿起她给我的《工人日报》来，在里面的一页上找到了这样的通栏标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自供状”<sup>①</sup>。我看了这篇文章，同时也看清楚了想要同能够发表这样文章的人去接近，是行不通的。那是从十几种来源拼凑起来的谎话和半谎话，总起来要证明我不仅仅恰好是个间谍，而且还是个托派，是个铁托分子，以及半打以上其他相互矛盾的坏东西。我后来听

---

<sup>①</sup> 它是用读者来信的形式登在1950年1月25日纽约《工人日报》上，几乎占满了第八版的整个版面。——译注

说，这篇文章是在旧金山拼凑起来的，首先发表在《人民世界》上，《工人日报》是从那里弄来的。几年以后，在莫斯科宣布给我平反后，我接到一个女人从旧金山来的一封可怜的信，她为当年允许用她的名字来搞出这篇文章道歉。我不准备公开她的姓名了。她没有写这篇文章，但是在它上面却签了字。那是一群美共党员编写的，企图以诬蔑我的谎言来帮助莫斯科。这就是由于他们连真实情况都不愿讨论和分析，结果就迫使一个党和它的报纸以及它的党员都落到了这样一种境地。

在美共党里有一两个党员曾表示过一些愿望，想弄清我的案情，并帮我回到进步运动中，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们全都因此而受到了迫害。允许我在帕洛阿尔托举办中国讨论会的那位进步党的县委书记，她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后来被开除出党，她对我的宽大即为其罪状之一。海伦和沃威克·唐普金斯都是美共党员，当我刚回到美国，还在东部住在爱米莱·皮尔逊医生的住处时，他们就从洛杉矶写信给我。海伦首先给我写信说，她开始时完全相信莫斯科对我的指控，但是她是一个专业心理学家，她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控告我的罪名不可能是真实的。她说，“一个人在苏联搞间谍活动，并且用谎言掩盖它是可能的，但是不管是谁，象

你多年来那样激励别人来热爱苏联，而她自己却一点也感觉不到那样的爱，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就问我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写了回信。于是，我们之间就开始通起信来，不久她的丈夫沃威克也参加了进来。后来，我搬到洛杉矶以后，我遇到了他们，他们成了我的朋友。

尤其是沃威克，他在所有政治运动中都是一个党的积极分子，他同旧金山的州党委很熟识，他特别觉得必须要求他们听听我的申诉或者对我的案子进行一些审查。

他的企图失败以后，我建议他不要再进行了。“你帮我是不会成功的”，我警告他，“你只会使自己陷入困境。”我知道他是非常珍视党籍的，我不愿意看到他丢掉。

“我不是为了帮助你才这样干的”，沃威克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党的统一完整。”我告诉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再劝阻他了。我也感觉到，对于反对一个党员的案子拒不研究，的确涉及到党的统一存在问题。

沃威克和海伦都因为敢于提出我的问题而被开除了。当党的监察委员会问他们是不是认为苏联做错了时，他们回答说，苏联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就立刻被指控为“反苏的叛徒”。

不管美共对我的排斥是怎样冷酷难受，我一直三年没有承认同它的关系的破裂。许多年来我一直是个秘密党员。我不是一个完全正式的党员，因为我从来没有被准许参加一个组织，也从来没有享受同别的党员一起讨论问题的权利。这是因为党觉得我的最好的工作是继续在苏联生活，并以莫斯科为基地，访问世界各地的革命，同时主要为美国而写作。他们也不要我为党报写作，因为它已有够多的写作者。但是却要我在进步报纸上尽可能获得最广泛的读者。因此，我的党籍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我每隔一两年到纽约来一次，到党的总部直接把党费交给司库。

过去这种作法促使我在洛杉矶采取了一种行动。我认为我所处的地位是没有任何机构或党的委员会有权力不听我的申诉，就撤销我的党籍。我就决定交付应交的党费以及通常外加的捐献，并从他们取得收据。我是怀着这样一种念头的：如果一旦给我平反了，并接纳我到党内来，我就能够证明我一直是一个党员。我是通过为党的法律案件工作的一个非党律师来交付党费的。他为我从党的地区组织人员那里取得一张“一位友人”交付的一笔钱的收据。我这样做了两次，第一次付了两年的党费，第二次付了一年。后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无益的，象是有意做作的姿态，而且如果共产党作

为一个组织拒绝同我讲话，我是没有理由一定要同他们讲话的。

这时，我已经在进步运动中得到了新朋友和一项不断扩大的新工作。

在那些年代里，关于我同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如果不再加一件事情，就不够完整。在纽约的一年里，我试图同陈翰笙通信，我以前认识陈，知道他能提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可靠情况。以前我写《明天的中国》时，他曾帮过我的忙，我为德波戴公司写《中国人征服中国》时，那是一本更大的书，我再一次需要他的帮助。他住在费城，好象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常到波士顿去。他和任何一个美共党员一样，很难同他讲话。如果我提出要在费城见他，他就会不在费城而在波士顿。不过，我知道如果我为了写中国的书需要他的帮助的话，他一定会答复我，假如急需回答，打电报都行。我欣赏他的这种微妙的态度。由于他极力避免见到我，我不用问就知道：由于莫斯科的控告，要想访问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同时我也知道，不论我的什么工作，只要同中国有关，他都愿意帮助我。我非常欣赏这种态度。

\* \* \*

在从莫斯科回来以后的六年中，我坚定地使自己适应美国的生活，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南部的生活。我

没有放弃最后回到中国去的希望,但是我知道,只要莫斯科的控告继续存在,那就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抱怨苏联,因为我已经推想出有许多事情是可以促使苏联那样干的,而我在想要得到莫斯科的允许来通过他们的国家进入满洲这件事情上,那样的轻率,甚至惹人恼火的态度,也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我甚至也不埋怨美国共产党,但是当我一再试图同他们联系,并想得到他们的帮助来弄清我的问题,而在三年中连一个简单的答复都没有得到以后,我不再寄希望于他们了。同时,我找到了有益的工作,并且通过工作得到了新的朋友。假如说我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生活,不完全是我要选择的一种生活,但也不是不愉快的,也不能说是没有成就的。

回顾过去,我在这个期间的主要收获,看来是:我有了一种新的自力更生的精神。我首先是在写作方面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过去,我的工作主要是一个记者。虽然好的报道总是有创造性的,因为记者要自行选择所要描述的事物,和阐明事件的方式,不过我报道的都是莫斯科表示的观点,或者是别的国家领袖们的看法,而不是我自己的看法。我选择去延安,并写文章讲“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说,在整体上支持我所描述的观点。不论在哪个国家里,我的作品都不曾被什么正式检

查制度搞走了样。单就过去的这个事实来看，我可以说是自由作家。

可是，在现在发行我的小型油印刊物《今天》时，我每个月得自己来研究整个世界的新闻全貌，而且要问的不是苏联人或者中国人想的什么，应该传达给美国读者，而是得问我自己什么重要东西是应该传达的。这比我过去报道多少同意的别人的论述更费心思。同时，我并不忽视莫斯科或者中国在说些什么，也注意美共在他们的刊物上说些什么。他们的观点我都重视，但是却不再受他们的限制。《今天》上所写的东西，都要由我一个人来负责。

我回想起有一次我去旁听审判西海岸某些共产党领袖的案件。我不是坐在记者席上，而是坐在后面很远的听众席上。那时我早已使自己适应了这样的情况：在这种集会上有些人会同我说话，但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则不同我说话。我已经完全接受了这种处境，所以报道这次审判时，我不仅能够对于法官的不公正的态度感到相当愤慨，而且对于那位从加利福尼亚北部来的女共产党员那样的勇敢与说明全部共产党案情的口齿清晰，感到真诚的钦佩。而且，我同时对于这位妇女感到一种强烈的羡慕，因为她即使是要受到坐牢的判决，她也远远不象我那样的孤独。她为一群同志们所

拥护，而这些人体现着我仍然认为最终必定胜利的世界观。一年多以后，当这位曾经是共产党发言人的妇女，由于某种我从未见到清楚说明的原因而离开了党，这却把我搞糊涂了。不过，我也已经觉察到我自己所写的文章，虽然从未攻击过美共，可是在评论世界大事方面，已经开始不时地离开了他们的看法。

在经济方面我也越来越自力更生起来。我本来一直能够用我的演讲和写作使我自己过得很舒适。但是这样的机会突然没有了。在纽约和波士顿，用大力安排定期演讲会来支付我到东部去的旅费，还是有可能的，但是除了旅费以外，我在演讲方面实在是搞不到什么收入的。至于写作，自从德波戴公司出版了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由于共产党控制的书店的抵制，没有能使出版社挣到钱以后，没有人再要出版我的书了。我初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国民前卫报》支持我在他们的报上发表文章，后来也曾建议我再给他们写些文章；可是，这一努力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前卫报》抗不过美共的严重反对；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自己寻找写作材料很困难。

没有作家能在真空中写作，特别是记者，确实如此。我记得《前卫报》要我写一些关于加利福尼亚山谷地区的农业季节工的事情，听说那里的孩子们饿死在

沟边帐篷里。我开着我自己的小汽车，开过群山到了贝克斯菲尔德和弗雷斯诺，在城里和在那个山谷的农业地区辛苦地工作了好几天，却没有写成功。我感到所有我过去的作品，都是依靠同熟知情况的当地人谈话才写成的。为了写农业季节工，要想取得写作材料的正常方法应该是先同当地劳工领袖和为帮助季节工人而进行组织工作的当地共产党员去谈话。可是这些人是不愿意同我讲话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是不可能写出什么《前卫报》能够接受的东西的。

职业写作和演讲不能维持我的生活，我就有时能做别的工作。并不只是我有这样的问题。在美国很少有革命的作家能够专靠写作来生活的。有几个人以重建和改装房屋来补充他们的收入，我就采取了这个办法。可我从来不是一个熟练的木工，不象小鲍威尔那样。他从中国回来时，发现他在上海长期作编辑的经验不能使他在美国找到一个职业，他买下了一座又一座的小房子，他一面住在里面一面改造它，他这样来生活并养活他的妻子和小孩。他可以用自己的手来增加几间屋子。我缺乏这种技能，但是我很快发现我有本领去找到那样的旧房屋，由于建筑上的缺陷或者由于房屋安排上的不合适而卖不掉，只能廉价出售。我就买进这种房子，并住在里面，我能重新改造，使我最后

能以相当高的价钱卖掉。在这方面我不久就发现了那些年代里美国经济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帮了我的忙，这就是说，在房屋交易上，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价格，用美元计算起来，总是在上升的。

我从来没有整天干这一行业。很早以前，在大学的最后几年，我就是自己一面学习一面工作过来的。那时我就明确地认识到，如果学生们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教育上，而同时又能以临时职业来维持生活，但在毕业之后，他们却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营生上，那是非常愚蠢的。之后我就确定将来我一定要选择一种我愿意做的工作，而不管我能不能以此为生。假如有必要，我就以副业来维持生活。我又受到卡雷顿·比尔斯的一种说法的影响，当他在墨西哥呆了很久，回来对我说：“我发现不论在哪个国家，一个聪明人实际上不会因缺少工作而饿肚子的，同样也不会挣大钱的。”于是，我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买进和改造房屋方面，而是放在写作《今天》期刊上，以及作为写作材料的旅行上面（例如到危地马拉的旅行）。买卖房屋是一种副业；在这方面我很快就确立了一条原则：除非是我个人愿意住的房子我不买；同时，除非便宜、合算，我也不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从帕洛阿尔托到洛杉矶，由于种种原因我搬了好几次家。我总是买进我要住的，而且要

比付房租便宜的房子。我学习了一些房屋修建方面的小手艺，我能够自己来油漆屋内，有时甚至屋外。我发现我从事这一副业的那些年里，改善我住的房屋，不仅能挣出维持我的生活费用，而且我在银行的存款也增加了。

# 8

## 意外的平反

**我**从莫斯科被驱逐出境六年以后，莫斯科当局撤销了对我的控告。象我从来不知道被捕的原因一样，我也从来不知道给我平反的原因。我只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坐在洛杉矶城里家中书房里，正写着下一期《今天》要用的笔记。电话响了，电话里的声音介绍他自己是赫斯特某一家晚报，这立刻使我警觉了起来。

电话里的声音问道：“你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吗？”我回答说，是。“你就是几年前在莫斯科作为间谍被捕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吗？”我肯定地说，没有错。

“你听说莫斯科撤销了对你的控告，说你是无罪的吗？”我说我还没有听到。

电话继续问：“你对这有什么话要说？”

我说：“如果是真的话，那太好了。”

电话里的声音解释说，消息来自他们的伦敦分社，他们要知道我的反应。我除了说如果能够得到证实，我很喜欢这个消息之外，拒绝再说更多的话。

我刚刚放下电话它又响了。这次是从纽约来的长途电话，说话的声音介绍他是哈利·曲沃尔茨。我想，《纽约时报》这么远打来电话，一定有点什么是真的了。所以当曲沃尔茨继续说下去时，我已经作了思想准备。他说：“我想你知道我为什么打电话。”

我回答说，我刚刚听到一项惊人消息，正在想它是不是真的。曲沃尔茨告诉我，这消息是由莫斯科无线电台发出，再由《纽约时报》伦敦分社转播来的，它说1949年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控告是贝利亚搞的，控告的罪名已被发觉是不真实的。曲沃尔茨问我：“你有什么想法？”我回答说，我认为这消息很好。

曲沃尔茨继续问：“你满意了吗？”我回答说，我不仅满意，而且非常高兴。

曲沃尔茨继续说：“我的意思是，你对于贝利亚应受谴责这一点满意吗？”

“我怎么能知道？他们在莫斯科是应该知道的。贝利亚是管监狱部门的头头，我想他大概有责任。”后

来我听纽约的朋友们说，我给了“很好的答复”。他们说，曲沃尔茨很明显是想诱使我说一些可以转为反对苏联的话的。我在那时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根据长期以来在演讲时回答容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所形成的经验，就半自发地作了这样的回答。

接着，过多的要求谈话，要求在电视上露面和为电影拍照而使我不胜其烦。在这许多谈话和在电视上出现中间，我终于想起我还完全没有接到莫斯科或者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的正式通知。我同时也想起来苏联大使我是认得的，我曾在莫斯科我的家里招待过他，他和我已经去世的俄国丈夫曾在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共同主持过苏联的展览馆。

于是我就给苏联大使写了信，告诉他我已经得到了苏联政府给我平反的消息，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因为许多家报纸都发表了这个消息。不过由于我本人不断地被问到这件事情，并且已经三次在电视节目里出面来回答问题，我很想得到关于确实情况的某种正式说明。这封信，大使自己没有给我答复，大使馆的参赞答复了我，说大使指示他给我寄来《真理报》的剪报。他寄来的剪报只有几行长，它是那样短，我还能记得它。除了“记事”一词以外，这条剪报没有别的标题。它说在1949年2月，新闻记者安娜·

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国家保安部门的官员（贝利亚——阿巴库莫夫）所逮捕，并被指控为间谍而驱逐出境。苏联的检察机关调查了这一控告，发现控告没有根据。所以该项控告应予撤销。

我仔细地把剪报读了好几遍。我反复地把它想了好几天。扼要地说，它是清楚的和令人满意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透露的情况太少了。它没有说贝利亚是“错误地”或者是“恶意地”干了那件事，或者是“根据上级指示”那样做的。它一点也没有说到为什么要那样指控我。同样它也一点没有说到由于什么原因，以及在什么时候，检察机关审查了这个案子，并发现控告“没有根据”。六年已经过去了；检察人员可以在六年前就注意到了这件事，或者是一个月以前注意到的。一点也没有说到，由于什么使他注意到了这件事。是不是他主动要复查贝利亚经手过的全部事情，还是由于我在美国的朋友们写信去的压力，引起了他的关心？我知道有些信在不同的时间里写到了莫斯科。我特别注意到“唯一神教会社会正义团契”所写的抗议信，那是迄今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个要求莫斯科重新考虑它的指控的组织，我还听说过有一两起个人发去的类似的抗议信。《真理报》的声明一点也看不出这些抗议是不是收到了，并且经过了考虑。

我越考虑这条剪报，越发现更多的不足之处。我接着开始感觉到这一声明纯粹是消极的东西。虽然莫斯科撤销了我是间谍的控告，可是它并没有声称我是苏联的忠诚的朋友，象我三十年来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它没有说我现在能够得到返回苏联的签证，或者经过苏联回到中国去的签证，而这是我所需要知道的正面的东西。

尽管如此，这一声明有其足够的重要性。于是我就很快地行动了起来。从《中国建设》这家刊物上得知，陈翰笙是它的成员之一。我回忆起当我被指控为间谍时，他虽然不见我，可是他还是愿意从远处帮我改正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于是我就给他写信，提出我想回到中国的问题，说早在延安时，我曾被邀请再回中国来，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想回来，但不知这一邀请是否仍然有效？最后我接到了一封友好的回信，邀请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客人再回到中国来。并且说，在我愿意停留在中国的不论多长的期间里，他们将提供作为一个作家进行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方便条件。

我当即根据这封回信来开始计划我的未来。

\* \* \*

我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申请一张美国护照。我的

申请被拒绝了。虽然事实上我曾持有一张美国护照达三十多年之久,而我也从来没有不正当地使用过它,但是国务院在发护照给共产党人或者任何“亲苏的赤色分子”的问题上,它的政策变得很僵硬。美国的许多知名人士,如保罗·罗伯逊,<sup>①</sup> 罗克威尔·肯特<sup>②</sup> 和其他许多人,都被拒绝发给护照,他们已经为取得护照而进行诉讼了。这时我也参加进了这一行列。听说进行诉讼,需要找一个准许在华盛顿特区法院执业的律师,我就去找莱因·福来尔,这是一家已经接办这类案件的律师事务所,他们也接办了我这个案件。福来尔向我解释说,为了护照打官司,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好在别人打这种官司已经好几年了,我可以利用正要对他们作出的判决。

为护照而打官司,需要经过好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需要相当的时间和不断增加的费用。第一次拒绝是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护照处。第一次申诉就必须先找这个护照处。然后开一次讯问会,申请人必须亲自到华盛顿去面对护照处官员组成的委员会。经过了好几个星期,我被允许举行这么一次讯问会,会议是在有关官员空闲的时候举行的。我必须从加利福尼亚到华盛

---

① Paul Robeson, 美国著名黑人演唱家。——译注

② Rockwell Kent, 美国著名艺术家。——译注

顿。我面见护照处的官员们是由福来尔先生陪着的。这些官员们查问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活动。他们要证明我在美国的活动，显示出允许我到国外去旅行是不符合美国政府政策的利益。他们的问题，很多都是平常的细小事情，也有一些则是意外的严重，常常是一些我简直都已记不得的事情，但是美国国务院却有材料来自在国内外的特务人员。所有他们问我的事情，都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美国国务院是怎样来解释我的这些活动的，而我自己原来的看法则同他们的很不一样。

例如，他们问我在1943年是不是乘了一架苏联的“军用飞机”从阿拉斯加飞往莫斯科的。在有些惊异之后我回答说，我确曾坐过一架我认为是美国的飞机，从费尔班克斯飞往苏联，我坐这架飞机是得到了美国军方同意的，而这架飞机是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对德、日作战中，根据“租借法”援助盟友的一个项目交给苏联的。也许这架飞机经过某种转移就变成苏联的军用飞机了。它是在哪里转移的，我自己确实不知道，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在哪个地点它的驾驶员不再是美国人，而变成一个俄国人了；也许是在西伯利亚着陆以后，也许是在诺姆。我自己认为它是一架美国“租借法案”飞机。

他们又问我，1947年我是不是坐在一艘苏联海军运输舰上，从那时苏联还占领着的大连港去到海参崴的。这再一次使我惊异了。我回答说，我坐的是从上海到海参崴的普通苏联船，它对持有签证，准许进入苏联的任何旅客都卖票。这条船在大连停了一下，搭上了很多看来象是俄国人的旅客。是不是在这里它变成了“一艘海军运输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是从上海开出的普通船。我还被问到我曾在大连作过的一次演讲，那次演讲非常偶然，我早已忘掉了。那时连船要在大连停靠我都不知道。当我知道它要停不只一天时，我就决定上岸了。我发现我受到了当地中国人的欢迎。他们显然是掌管着当地的政府，他们急切地想知道我在延安看到了什么。据我所见，他们既不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也不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他们象是自己组织了一个地方政府。我确实没有说过护照当局所引述的那些话，很显然那些话是他们的某些特务人员送给他们的。不过，也不难看出来，我对美国军事援助蒋介石是会说些话的，这些话由于翻译的不高明，和特务们为了要证明他们所说的情况而有意夸大，结果就变成了主管护照的官员们证明我对美国政府的批评了。

我又被问是不是曾经在某一天到过克利夫兰，在

很晚的夜间参加了一群共产党的集会，去传达从莫斯科来的指示。这是最愚蠢的指控中的一条。我回答说，我记得大约在他们说的那个时候，在克利夫兰有过一次演讲会。这次演讲会也象其他演讲会一样，是由一个代理人给安排，并在报纸上登广告宣传的。在这些演讲会之后，我通常多半被带到主席或者赞助人委员会的某人的家里，在那里我会吃一些点心，回答一些客人提出的问题。我不记得在克利夫兰是不是有过这么一次集会，但是通常是会有的。我从来没有传递过什么秘密指示，也从来没有以为那种集会上的客人是一群什么秘密人物。

在这一类琐细的问题中间，护照处的官员们突然象扔出一颗炸弹似的问我，是不是有一年，我从莫斯科回到美国，担负着为苏联搞间谍活动的任务。圣路易斯某报的记者曾写过文章说，托洛茨基逃亡在墨西哥时，他的一个秘书曾经这样告诉过他。我当然要愤怒地否认了这种最荒唐无稽的谣言。不过，我觉察到我面对着的官老爷们，他们并不对事实有兴趣，而是对编造一个什么报告来证明一个人的罪名有兴趣。

所以，我对于护照部门决定再一次拒绝发给我护照，一点也不奇怪。我感到奇怪的不是决定的本身，而是他们经过了好几个星期才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而

且，他们在我回到加利福尼亚以后给我的正式文件里，把他们提出过的大部分问题都罗列了出来，简直是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地搅混在一起。我通过一个代理人在克利夫兰安排一项演讲，是一项很普通的例行活动，而他们却把关于这项活动的指控，和我曾正式为苏联雇为间谍的指控，等量齐观。后一罪名如果属实，是严重得足以作出坐牢多年的判决的。护照部门的官老爷们为拒绝发护照而编排理由的愚蠢，使我想起了莫斯科监狱里审查我的那个官员的同样愚蠢，他把我为《莫斯科每日新闻》访问苏联建设事业所写的笔记本都摆出来，作为我曾经作了多年“间谍”的证据。

福来尔先生安慰我说：“这只是第一次讯问，我们现在知道了他们将采取的方针和方法了。”我开始了解到为什么这些诉讼活动要花那么多的钱。全部诉讼过程都是由一个高工资的速记员记录下来的。为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的律师必须获得第一次讯问的全部记录资料经过签证的正式副本，在此基础上进行法律研究，并准备将来如何答辩。因为整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是由敌对的当权者确定的，一个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护照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就得破费好几千元，还得花上五年以上的时间。

至于我这个案子，福来尔先生确信地说，则不需要

花这么多的钱和这么长的时间。事实是我只花了三年。我回到华盛顿去进行第二个阶段的诉讼，这次是向国务院直接进行申诉。在这个阶段，护照处把它反对我的案卷送给国务院由其他部门的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这里的判决，象每个人所想象到的那样，也是否定性的。虽然如此，这个阶段还是非经过不行。国务院的最后拒绝，在论调上同护照处第一次那种半通不通的报告可大不一样。这第二次的判决文件是由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亲自签署的。文件经过精心撰写，配得上这么高位人物的签字。

这次没有把各种各样的行动和罪名愚蠢地搅混在一起。这个文件，把我在莫斯科被捕以前以及被控告的六年当中和平反以后的一个阶段中我的全部行为，都进行了精细的分析，我的公开行动更为《工人日报》对我的评论增加了声色。把这些言行串连起来，美国国务院正式作出结论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自始至终都一贯是“献身于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一分子”，因此，必须拒绝发给美国护照。

这是一份值得当作鉴定书保存起来的文件。事实上，当我把这份文件给平反后来找我的洛杉矶美共的两位领导人看时，其中一位说，“看来，杜勒斯先生对于你的活动比我们还要清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接近 1957 年末的某个时候,福来尔先生问我要不要他为我的护照采取诉讼的下一步骤,因为国务院已经最后在最高一级上正式拒绝了我,这大约已花费了我两年时间。我现在可以通过我的律师,向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起诉,要它迫使国务院发给我护照了,这是我的权利。但这将是一项很费钱的诉讼程序,因为必须备好前几次讯问会的诉讼记录和国务院的答复等文件副本,而这些东西都必需是经过正式签证的文本,连同我的律师的答辩文件,都得送呈法院。所有这一切,包括我的律师的出庭费用,差不多将会花费一千元。但是目前就要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因为除非最高法院对于已经摆在它面前的案件作出了对我有利的判决,否则法官是不能作出有助于我的判决的。所以,要福来尔先生强使法官这时作出判决是不明智的。不过,最高法院已经同意在 1958 年上半年处理罗克威尔·肯特的案件以及其他一些案件,这意味着那些案件可能在 4—5 月间开庭,6 月里作出判决。福来尔先生解释说,这项判决有三种可能:其中之一是受到否决,在这种情形下,即在已经否决了一件类似的案件之后,我得决定还要不要再上诉最高法院。其次,这项判决也可能是同意了罗克威尔·肯特的护照要求,但其理由却不适用于我,在这种情况下

下，它对我就没有什么帮助了。

不过，如果这项判决同意发护照给肯特，其理由可以适用于我，也适用于其他千百件同类的案件，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同意给他护照的理由和我们起诉的理由相同，即国务院无权根据政治信仰的原因来拒发护照，那么，我的上诉一案，就可以利用它了。情况如果真是这样，福来尔先生就可以立即到法官那里，要求发出一道法院的命令给国务院，要它在最高法院刚作出的判决的基础上，把护照立即发给我。

我很感谢福来尔先生把可能的抉择说得那么清楚，我就告诉他继续进行下去，把案子送往特区法院。我要准备好在1958年6月里迅速行动。我说，让我们假定最高法院的判决将会对我们有利吧。同时我也下定决心，但我没有告诉福来尔先生，不管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否有利，我在6月里一定要到中国去，即使没有护照也要去，莫斯科和国务院造成的拖延，已经使我等了十年多了。这已经够长了。

\* \* \*

在1958年6月里，福来尔先生把我的护照送了来。他正确地预见到了最高法院的判决要在那个时候作出来。他并且能够把我的护照也搞了来，虽然我的护照须在罗克威尔·肯特案件的基础上才能搞到，而最高

法院判决后，肯特先生还得等上好几个星期，因为按法律规定，国务院有权利在这期间作一次申诉。但在最高法院判决后的那一天，福来尔先生就去到华盛顿特区法院，要求他们指示国务院发护照给我。他们就在罗克威尔·肯特案件的判决基础上这样做了。于是，护照连同苏联的签证很快就送到洛杉矶，交给了我。

\* \* \*

在国务院一直拒绝发给我护照的那三年里，我并不是闲着没事干。我不只一次从加利福尼亚去到东海岸，进行巡回演讲。我尽可能使这项活动同到国务院去申诉的时间一致起来。莫斯科的平反，撤掉了美共为反对我的活动而对我进行了六年的抵制，使我在各地的演讲重新成为可能。党本身过去没有直接给我安排过演讲，这时也没有这样做，但是他们的抵制和他们的赞助之间的区别，各地的共产党员，根据《工人日报》报道和我的演讲态度之不同，是很容易推断出来的。他们的赞助或他们的反对是足以影响各地大多数进步组织的。这些组织都知道资助进步演讲的困难之复杂性。有些较大的组织，例如纽约和波士顿的社团教会，他们有公开讲坛，强大得可以忽视共产党的态度，可是这样的组织不多，而且也不容易负担横跨国境的旅行费用。但是，资本主义世界报纸广为登载的莫斯科为我

平反这一事实的积极作用，再一次使广泛分散而活动积极的各地共产党员能够促使当地某些组织，例如他们是某个大学的学生，或者他们是某个讲坛的会员，来推选我为演讲会的主讲人。

我在美国还有好些工作必须做完，其中之一就是我的书《斯大林时代》的写作。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攻击斯大林时，我正在东海岸巡回演讲。当天上午那震动人心的揭露在《纽约时报》上出现时，我正好要在同一天晚上作一次关于苏联的演讲。我知道，那天晚上的听众是一定同我一样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的，他们会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解释，希望我能提供给他们一些思想上的支持。我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来准备那次演讲，想着我应该说些什么。很清楚的是，赫鲁晓夫的演说攻击的不仅是斯大林，而且是可以称之为“斯大林时代”的整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苏联建设了社会主义。这是历史上若干最伟大的生机勃勃的时代之一；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世界的生活。它不仅建设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建设起了遏制希特勒的力量。它又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发生了千万件残暴的不公正和粗野的压迫事件。这就是赫鲁晓夫在片面攻击中所列举出来的，并且全部归罪于斯

大林一人身上的事情。这样的片面攻击威胁着苏联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

因为我自己是在斯大林时期生活过来的，而且在相对小的程度上也经受了它的不公正，我觉得我必须对赫鲁晓夫演说的消极内容进行一些答辩。那个时代的坏事情，来自多方面的原因——来自俄国过去的习性，来自敌对包围圈的压力，来自希特勒的第五纵队，同时也部分来自领导人的性格。但是我清楚，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所有坏事，不管是来自客观的必然，还是来自错误和罪恶，比起使苏联人民吃尽苦头的西方世界蓄意进行的干涉战争和希特勒的侵略所产生的坏事要轻微得多；甚至比美国推迟已经答应了的“第二战场”的开辟，致使苏联人民遭受到的更多的痛苦，也要轻微。即使我们不把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看作是斯大林时代的成就之一，难道我们能忘掉1940年法国军队是怎样在十一天之内在希特勒面前垮掉的？以及欧洲是如何恐惧着一个新的千年黑暗世纪的来临？难道我们能忘掉“主宰世界的种族”的宣扬者对整个人类的袭击，以及这一袭击如何为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儿女们所粉碎？在我看来，今天世界人民得大大感谢斯大林时代才对。

在那天晚上以及以后的几次演讲里，我讲了这样

一些话。当时旧金山劳工学院的院长郝兰·罗伯兹对我说：“我认为你应该写一本关于斯大林时代的书”。我同意了。这样的一本书看来是需要的，而我是最适合写这样的书的一个人；我在许多书中已经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而这些书的大部分都已绝版了。那年夏天，我就带着一个秘书，住到洛杉矶附近一座山上的房子里，从过去写的许多关于斯大林时期的书里摘引材料出来。然后我又摘引了十二大页赫鲁晓夫反对这一时代的话，同我自己所见到的情况相互比较。就在这个基础上，我把书写了出来，并于1956年由两家出版社出版，其中一家是美共在纽约的出版社，另一家是“今天出版社”。地址在加利福尼亚，阿勒台登纳，也就是出版我的刊物《今天》的那一家。

这是“今天出版社”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也是《今天》的最后一种出版物。

\* \* \*

郝兰·罗伯兹从帕洛阿尔托打电话给我：“你应该立刻去参加斯德哥尔摩的和平会议。你能够很容易得到一张出席会议的证件。你可以从洛杉矶坐飞机飞过北极到那里去”。当我问他为什么我应该去斯德哥尔摩时，他回答说：“因为那是你能够遇到多年来你一直想要见到的人们的最好的地方”。

我听懂了他的意思，我就打电话给航空公司预定了去斯德哥尔摩的飞机票。然后我打电话给克伦威尔的皮尔逊医生，我知道她多年来想到中国去，但是好幾次都错过了机会。其中一次还是由于她帮助了我的原故。当她早在童年时期，有一位从中国来的传教士住在她父亲的家里，说起中国来总是称赞那里人民的品德，这就使她开始对中国发生了兴趣。后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和“长征”的新闻，中国，在政治上对所有的进步人士就变得重要起来。1937年，皮尔逊医生作为“美苏友好协会”的委员，参加了一次莫斯科大会，得到了一张穿过西伯利亚并经过中国的回程火车票。她在火车上时，正巧日本人侵占了芦沟桥，把战争向南扩展，于是，火车就带着它的全体旅客，经过朝鲜，转往日本了。

她最近一次没有去成中国，是发生在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要在中国开会的时候。多年来皮尔逊医生就是参加这个国际组织的“美国妇女大会”的积极分子，她常被选为参加国际会议的代表，部分原因是她能付得起她自己的旅费。当1950年初，大会宣布要在新德里召开时，她带着她的养女自费去了印度，花了不少的钱。在她到达印度之前，会议由于尼赫鲁不准在印度举行而改到布达佩斯去开。由于“美国妇女大会”

的疏忽，这一变动没有通知皮尔逊医生，她就在知道会议不在那里举行之前，一直到了印度。当她最后回到纽约时，“美国妇女大会”的人员对她表示歉意，并肯定地答应她下次召开国际会议时，她们一定派她为代表去参加。

下次会议是1954年在北京召开的。那是一次特别为亚洲人开的会议，但是其他国家的友好代表也都邀请了。“美国妇女大会”被允许派三名代表去参加。这次大会，当解放后不久的最初几年中在北京召开，是皮尔逊医生最想要参加的一次大会了。可是，她虽然是“美国妇女大会”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但是有这么一次国际大会，连通知她都没有通知，直到两位代表已经离开美国去中国后，不再有足够长的时间可以让第三个人去时，她才知道这件事。这个花招是特别为阻挠她而安排的，因为去的两位代表同她很熟，却特别受到嘱咐不准告诉她。

事后委员会的主席告诉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派你去？就是因为你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要好”。这是我所知道的美共惩罚人的最严重的表现——皮尔逊医生是好几个进步组织多年以来的长期成员，不是由于她自己的过错，而单单是由于我从莫斯科回来病倒了，而她帮助过我，就受到了这样的惩罚。我听到了

以后曾对她说：“爱米莱，我一有机会去中国，就请你同我一起去”。

所以这时我打了长途电话给皮尔逊医生说：“我在几天之内将飞往斯德哥尔摩，计划还要走得更远。你最好同我一起去”。她回答说，她得不到护照，由于她同美共过去有联系，她被拒发护照。我就告诉她：“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在他们再一次改变法律之前，赶快搞一张护照吧。给我在华盛顿的律师打个电话，他立刻就能给你搞到一张”。

几天之后，爱米莱打电话说，她将在斯德哥尔摩和我碰头。后来，我们一起在斯德哥尔摩同中国来的代表会面了，并同他们安排我们东去的旅行。

# 9

## 重游莫斯科

**关**于斯德哥尔摩会议，我的记忆很混乱。我没有正常地参加会议，因为我的身体很不好。我为安排离开洛杉矶，弄得精疲力尽。我本来想在走以前在山里休息一个月的，就是由于郝兰·罗伯兹的提醒，说斯德哥尔摩是会见中国朋友最好的地方，我才改变了计划。我拄着拐杖旅行，因为我的一条腿有毛病，越来越疼起来。于是我就打算在安排好去中国的事情以后，并在继续旅行之前，先在瑞典的一个什么疗养地方休息一个月。

我很快就同中国代表团联系上了，在他们中间找到了廖承志，我的一位老相识。我告诉他我想安排到中国去的旅行，他对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并且说我已经等待了好些年了。带着皮尔逊医生一同去，也没有

困难,她只想旅行几个星期。至于我自己,我还不能肯定我要呆多久。自从我1947年离开延安以来,中国一直是最想要写的地方,中国在我看来,对世界有最重要的启示。自从在延安的那些日子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已经变老了。我在延安认识的那些领导人,已经在掌管一个包括四分之一人类的大国了。他们肯定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时间,象在延安时那样,为我解释事情了。所以,我完全不能肯定我如何使自己适应新中国的生活。我清楚的是,我要去,并在中国写它两年——我计划两年,是因为这是护照的期限。可能的是,也许象我以前常常从莫斯科回到美国去作关于苏联的演讲那样,到时我也从中国回去作关于中国的演讲。另一方面,也许我发现在中国的生活是那样满意,以致使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这些话,没有必要同我的中国朋友们说;我想他们是都理解的。不管怎样,我在洛杉矶就是这样来安排我的事情的,使我可以不定期地呆在外面,如果我想要的话,我也可以回来。我对中国朋友们说,我极度疲劳,我想先找一个凉爽的休养地去休息一个月。我知道北京夏天很热,最好是夏天过了以后再到达那里。他们同意了。

可是,我没有在瑞典过夏。并不是只有中国朋友

邀请我。苏联代表团也邀请了我。当我解释在继续旅行之前，我需要休息一下时，他们回答说，从斯德哥尔摩到莫斯科的旅行并不长，而且同苏联代表团一起去，一路上他们可以安排所有手续，这对我将更方便些。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在莫斯科附近休息一个月。他们说的好象很有道理，而且也符合皮尔逊医生的愿望。于是我们就同意了先到莫斯科去度过大部分的夏天。在莫斯科我也有想会晤的老朋友，包括我丈夫的亲戚。

我们在莫斯科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苏联作家协会的负责人阿历克西·苏尔科夫几乎是马上就来见我，并且告诉我说，由于苏联当局曾经根据现已查明是虚假的罪名而采取反对我的措施，我有权要求赔偿物质上所遭受的损失。如果我曾经有钱存在苏联银行里，或者曾经在莫斯科有所房子，我有权把钱要回来，并得到一所类似的房子。因为个人来处理这些事情不很容易，苏尔科夫先生认为帮助我是苏联作家协会的义务。如果我把存款的银行名字以及我曾经有过怎样一种房子告诉他们，他们愿为我处理这些问题。因为这些事情需要花费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作家协会建议我在这期间作为他们的客人，或者到苏联境内我想要去的地方旅行，或者停留在一个休养所里休息。

我马上选择了休养所这个建议，在作家协会离莫

斯科不远的的一个舒适的休养所里，我度过了一个月。它提供了优良的设备，丰富的伙食和在树林里散步的机会。那里的建筑风格使我以为那是作家协会接收了的沙皇时代贵族住的房子。可是，我却惊奇地听到这是在革命以后才建造起来的。不仅它们的建筑风格，而且内部陈设也都适合于一个过去的年代。

我特别记得清楚的是，卧室虽然大，而且陈设得很漂亮，可是不仅没有私用浴室，而且盥洗盆没有装自来水龙头。在我的卧室里，代替这个的是装了一个既大而又非常精致的“弥沃尔尼克”，那是一种盥洗盆，它装有大理石浴盆面和一个由女仆每天装水进去的暗柜，当我适当地按一下那里的龙头，水就流进盥洗盆，漏到一个装在下方的大桶里去；那个大水桶也是用漂亮的嵌板隐蔽起来的。女仆必须经常弄空水桶，否则它就会溢出水来。可是在大厅过去不远的地方，就有几个公用浴室，里面有全套盥洗设备，包括冷热自来水。我奇怪的是，为什么这里的卧室就不能装上接有水管的盥洗盆。那些笨重的大理石“弥沃尔尼克”看来是明显的浪费，既浪费物料，又经常不断地浪费着人的劳动，更适合于封建时代，而不应存在于任何现代的休养所里。这仅仅是浪费的一个事例。

在这个休养所里的客人，大多数是作家。他们大

多数都是很有礼貌的。不过，其中一位曾借机攻击我，因为我写了一本关于“斯大林时代”的书。她碰巧在餐厅里坐在我的旁边，轻蔑地对我说，“看来你是赞成斯大林的了，你得更懂事一点才好。”我问她有没有读过我的书，她说没有。于是，我只告诉她我并没有完全赞同斯大林的全部行为，但是，虽然在他那个时期存在一些坏的方面，可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经济，并且打败了希特勒的军队。我说，所有这些成就，对人类都是重要的。她轻蔑地哼了一声就走开了。

除了这些小的烦扰之外，我从作家休养所里的休息中获益非浅，我很感谢苏尔科夫先生对我的殷勤。

\* \* \*

我住在莫斯科城内和郊外有限的几个星期里，曾不只一次地去看望靠近库尔斯克火车站，位于宽阔大街上我以前的那个家。我自己住的两间房子早已被外人占去了，但其他两间，原先指定给我丈夫的，他死后就给了他的两个寡居的姊妹，我同她们曾经合住在一起，这时这两间房子仍然属于我丈夫的这两个姊妹。她们欢迎我，请我去吃饭，并把其他几个住在莫斯科别处的苏宾兄弟姊妹们都找了来。在这期间，我丈夫前妻的女儿杜西雅也到莫斯科来访问亲友，她同她的丈夫和孩

子那时是住在列宁格勒的。同他们接触后我才知道，我的被捕对于苏宾一家则是一场比对我自己还要更大的灾难。看来，任何不公正的行为的后果，其涉及的方面要比直接受害者的遭遇大得多。

杜西雅的丈夫住在列宁格勒，他很少来莫斯科，我更难得看到他，就是由于我的缘故，使他在海军学院失掉了教授职位。据说，“作为武装部队的人员，他应该具有更高的警惕”来发现我是个间谍。他被指责没有尽到职责。失掉工作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因为在苏联，通常是容易找到工作的。但是他在海军学院的工作连带的使他有权利享有四间一套的漂亮寓所，在这样的房子里，他不仅使妻子和孩子们得到了住处，还有年老的母亲和一个姊妹也都住到了一起。而这些人这时一下子就都被抛到街头上了，结果只能在简陋的民房里住下来，这是一座住了一百多个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大建筑，他们只能围着床，用布幕互相隔成一个个小天地。等了好几年之后，杜西雅同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在城外一个较远的地方得到了一所小寓所，使她的丈夫每天不得不在路上来回花上好几个小时。杜西雅自己则由于有孩子，不能走那么远，只得在一所小学里找到她讨厌做的教书工作。

我另外一位朋友讲的和杜西雅自己讲的不一样，

我的这个朋友是从来就不喜欢杜西雅。她认为杜西雅的丈夫不是因为我的被捕而被革职的，而是因为他当教师不称职，而且特别是由于他是一个犹太人，而犹太人“在部队里是不怎么吃香的”。这也许对，也许不对。不过，不管实情如何，她丈夫同我的关系确实是被提了出来作为革掉他的职务的理由的，虽然他很少看见我，他同我的关系是那样间接。苏宾一家都相信这是革职的确实原因。他们觉得我给他们全体带来了不幸。

虽然如此，他们并不责备我。特别是这时莫斯科当局宣布了我无罪。他们清楚了我不应该受到责备的。过去的事已经不能挽回，需要的是将来不要受到毒害。他们亲热地把我当作他们的亲属，关心地问我在美国的生活。当他们听到我在美国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好几个侄子、外甥和侄女、外甥女，而我不是同他们住在一起，而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孤独地生活时，他们坦率地表示震惊。

苏宾的一个兄弟说，“你不应该那样生活，最好还是回到莫斯科来吧。你这里有的是亲属。我们的寡嫂在这里绝不会没有一个家和家属的。

这些家属间的关心的话使我很受感动。我切实考虑了他的建议。我在洛杉矶虽然有那么多的朋友，可

确实是常常很孤独。我的朋友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必须坐汽车才能见到。我常常是疲劳得开不动我的车子，更不能把它开到更拥挤的“快车道”上去；我知道越来越老了以后，我会更孤独起来的。非常肯定的是，我的视力越来越坏了，下次申请开车执照时，他们会拒绝我的。那时我确实会被孤立起来。所以家属的感情，确实使我很受感动。但是我真的想同苏宾家的什么人住在一起吗？答案是：我不要。我需要容易相处的亲友，可我也需要自己的私生活和我的自由。

我在莫斯科还有别的朋友。有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也许是我的最亲近的朋友了。他很早以前就认识列宁，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到了美国，1917年又回到俄国。他和他的美国夫人是我最喜欢同他们谈话的人。他们是我所知道的世界大事和苏联大事最正确的解释者。不过这时他们的健康状况都不好，特别是那个男的，卧床不起。我不能希望他们来看我，今后同他们会面，只会是我这方面所要努力做的事情。

我还有另一个朋友，当我和她都还没有结婚时，曾经同住在一所房子里，而今她在莫斯科大学教书，她有一所漂亮的寓所。我去看了她，并闲谈了很长的时间。我听说她写教科书挣了很多钱。因为她从工作中能够知道缺少那一种教科书，并且因为书的作者是根据书

的销售量得到报酬的，她可以由此得到大量的版税。我记得好象她在近年来大约已经得到了近三十万卢布了。当我向她表示惊讶时，她补充说，“当然不是全部都到了我的手里。”我问她是什么意思，她避而不答，只是说：“那不是个很好听的故事。”所以，我想那大概是在某种不完全诚实的基础上，把钱瓜分掉了。同时，我又注意到她原先那种心平气和，自然流畅的批评已经变成玩世不恭的冷言冷语了。我离开她的住所时，我们一同坐出租汽车到我的旅馆，她叫司机顺着大街走最近的路。可是司机却趁我们在后排座位上忙着谈话时，来了一个向左去的急转弯。当我们注意到时，发现已经向着大学开去，不能再退回来，除非绕很远的路。我的朋友责备司机，而他只是说，“我以为你的外国朋友喜欢看看大学的建筑物呢。”我的女主人只是笑着对我说，“他这样只是为了额外的收入。他们都是这个样子。”我自己也注意到出租汽车司机和旅馆的服务员要小费，脸皮都变得非常厚了。可是我吃惊的是，我的这位老朋友却把这些事情看得无所谓。

她同样笑着告诉我说，大学里有些学生，他们的父亲在苏联政府中占着很高的职位，他们会威胁老师说：“你如果不在考试中给我好分数，我的父亲就要革掉你。”她坚持说她自己可不惧怕这种威胁，也不对他

们屈服。可是，不管怎么说，她已经把这些当作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了。

\* \* \*

我从作家休养所回到莫斯科时，听说我的存款将要退给我；大约要给我三四千“新卢布”，这比我想的多。我被告知，这笔钱不仅包括将近十年的普通银行利息，而且还包括我的一些家具的赔款，例如我的电气冰箱和一台高级收音机，这些东西在莫斯科还是不容易得到的。至于房子问题，作家协会从房屋主管部门得到了一份许可证，分配给我一套内有浴室的两间屋子的寓所，房子的所在地区，还可以由我挑选。莫斯科的情况我是清楚的，我知道这所房屋的分配比退回几千卢布还更重要，更难得。

苏尔科夫先生愿意立刻派人陪着我到我挑选的地区去看房子。我向他致谢，但却拒绝了他的这一番好意。我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要一所靠近苏宾一家的房子呢，还是要一所靠近我那经常患病的老布尔什维克朋友的房子？还是靠近那位聪明而幻想破灭了的大学教授？这三家住得互相距离好多里，而莫斯科是一个那么广阔的城市。不管我住在莫斯科的什么地方，在莫斯科走动都是问题，问题包括雇出租汽车和坐公共汽车。看来，我自己得一切从头开始来建立一个家

了。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准备好了要这样？如果是的话，莫斯科在我心目中是不是这样一个地方？

这时我只对苏尔科夫拖延着说：“让我们等到从中国回来以后再说吧。”我已经希望不从中国回来了。但是我还没有把握。

\* \* \*

我们从斯德哥尔摩到达莫斯科时，很快就有两家俄国刊物来向我要文章了，那就是《新时代》和《莫斯科新闻》；后者并不是早在1930年我曾协助组织的那家《莫斯科新闻》，而是另一个不同的刊物，它是在早先那家停刊了一个时期以后才开办起来的。这两家刊物很快就付给我稿费。我在银行里开了一个他们给我卢布的帐户。当他们听说我计划去中国时，他们要求我从中国寄稿子给他们。后来我寄去一篇文章，分析在台湾海峡金门岛方面掀起的冲突，以及中国在这一敌对形势中的战略。这以后，我为莫斯科刊物写文章的事停了下来，这是由于我忙着别的事情，而《新时代》对我提供的材料也不再发生什么兴趣了。

\* \* \*

我在莫斯科遇到了好几位前《莫斯科新闻》的同事，大约是在我被捕的同时，他们都曾被捕过，包括总编辑迈克尔·鲍罗廷在内。他们大部分都很快就被释

放了，但是鲍罗廷曾被流放到一个劳动集中营里，并死在那里。这些事实，可能同原先在我心里对被捕的推测发生冲突。我认为我的被捕或者是由于一个较小的官员的错误，或者是由于我在莫斯科还没有承认中国革命的时期，就奋力去单方面地宣扬它，以致使他们那样逮捕了我。可是《莫斯科新闻》全体人员，包括鲍罗廷在内的被捕，和我的被捕接连发生，显示出二者之间好象有某种联系似的。如果有联系的话，我从来就不知道是怎么一种联系。我甚至不能想象，究竟是我的被捕是由于我同《莫斯科新闻》有联系的缘故呢，还是他们的被捕是由于他们同我有联系的缘故。

我知道鲍罗廷是爱中国的，同许多别的曾经在中国住过的外国人一样，他常常想念这个国家，而且希望能有一天回来。在别的和他同一等级的苏联官员们得到了莫斯科郊外的避暑别墅之后的许多年里，鲍罗廷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别墅，即使给他，他也不要。有一次他同我说：“也许有一天中国人会在庐山给我一座避暑别墅，供我老年时使用。也许他们认为我做过的工作是配得上的。”

前《莫斯科新闻》的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个是很快乐的。他们的确缺乏他们以前曾经表现出来的那种满怀希望的气概。事实上，莫斯科很少有什么能诱使我

留在那里了。鼓舞着我去组织早年的第一家《莫斯科新闻》的那种世界使命的思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单单是由于我年纪更老了的缘故吗？我怀疑。还是，所有的革命都要衰退？

无论如何，有些事情我还是想问问苏尔科夫的。我将动身去中国之前，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接受一大堆文件，这是十年前当作“罪证”从我的寓所拿走的大批文件和笔记，我在卢比杨卡监狱里曾最后看见过，多年来被保存在国家保安机关的档案里，这时要退还给我。凡国家保安部门挑选去的东西都被保存下来了。我高兴地发现，在这些文件里还包括有许多我早年参加登山运动的旧照片，那是在美国太平洋西北部胡德山和雷尼尔山上照的。我想象不出这些照片有什么“颠覆性”。我很庆幸它们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否则它们是会全部丢掉了。

我问苏尔科夫：“由于你同主管部门有那么好的关系，能够得到这些文件，也许你也能了解到为什么九年前他们把我抓了起来？”

苏尔科夫摇摇头说，“能够告诉你的人们可能已经不在了。”

他继续谈了一会儿过去的历史。他说，在斯大林的晚年，那么多的人被捕，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其他

许多苏联的中心地区。那个时期的全部案件都已在重新审查当中。例如，在乌克兰，好几千人的案件已经审查过了，他们大部分最后发现无罪，并“恢复了名誉”。当然，这时他们大多数已经死了。不过这样的档案记载对于他们的家属还是很重要的。

苏尔科夫说，“贝利亚确实是个坏蛋。斯大林信任他。因为他是一个格鲁吉亚人，早年就认识斯大林。斯大林老年时对俄罗斯人猜疑起来，对贝利亚则更加信任。地方党主席来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他们地方上的情况，有时他们那里的情况很糟糕，贝利亚就站在斯大林的身后，来的人可以望得见他。如果来人开始要诉说什么情况，贝利亚就严厉地怒视着他，以致使他怕了起来。斯大林晚年时并不真正清楚国内的情况，以及苏联农业中存在的困难，因为贝利亚干涉别人的汇报。”

我从苏尔科夫得来的这幅景象，说明了苏联发生的许多事情。这再也激不起我在莫斯科生活的意向了。我那时想，倘若一种制度是这样组织的，在上面的人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而手下一两个坏蛋就能够使他不了解人民的疾苦和要求，那就一定有什么东西非常错误。